

冷战后美国军事实力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得手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军事实力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军事战略先后经历了从“全球遏制”向地区防务、全球反恐、应对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挑战的变化。在此过程中，美国军事实力的其他要素，如国防费、军队规模及武器装备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冷战结束后第一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国防费、军队规模和某些种类的武器装备都被大幅削减。进入新世纪，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的国防费大幅攀升，军队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新式武器的研制、开发与采购更趋活跃。上述变化对美国军事实力的另一构成要素——海外军事存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军事实力则是其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撑。那么，什么是军事实力？如何衡量一国的军事实力？如何评估冷战后美国军事实力的变化？在英语中，“军事实力”一词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但又彼此相关的表述方式：military strength，更强调实有的军事力量；military force，侧重于描述兵力或部队；military power，一般指有形力量 and 无形力量、实有力量与潜在力量的综合；military capability，强调基于军事实力基础的军事能力或作战能力。目前对“军事实力”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美国军事史家皮特·帕雷特（Peter Paret）认为，“军事实力在一国的境内外体现并实施该国的实力，它也是政治权力最初得以确立并维持的工具之一。”我国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军事实力是国家或政治集团可直接使用的实有军事力量，其构成包括武装力量员额、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和军用物资等。

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认为，军事实力的评估包括三个部分，即战略资源、转化能力与作战水平。其中战略资源包括防务预算、人力、作战研发、试验与评估能力、防务工业基地、军事设施、武器装备与后勤支持等测评指标；转化能力包括对威胁的判断与战略应对、作战思想、培训与组织、军政关系、创新能力以及对外军事关系等评测指标；作战水平则包括军事技术与一体化作战能力两项指标，其评测较为复杂，需结合具体作战行动才能进行。我国的相关研究则从一国的国防费、常规力

量、战略力量、军事工业、军事技术、军事同盟关系以及军事战略等方面入手，评估一国的军事实力。

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军事实力具有丰富的内涵。它不仅包括可以量化的国防费、军队规模、武器装备等实有军事力量，也包括无法量化或难以量化的要素（如军事战略、海外军事存在等），其中实有军事力量中的常规武器装备部分既包括传统武器，也包括信息武器——后者通常被视为能力或技术，而非武器装备。因此，本文拟从美国的军事战略、国防费、军队规模、武器装备、海外军事存在等方面，探讨冷战后美国军事实力的变化。

由于一方面，评估国家军事实力的指标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上述指标并不能涵盖美国军事实力的全部组成要素；另一方面，有关美国战略意图、尖端武器装备、兵力部署的信息属于最高机密，可资利用的相关资料十分有限，所以，对于冷战后美国军事实力变化的研究只能尽可能地追求接近客观真实。同时，就上述任何一项指标而言，其跨越 20 年的变化都是纷繁复杂的，因此，本文的研究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

冷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追求动态中的平衡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军事战略经历了从“全球遏制”转向地区防务，再转向全球反恐，继而转向应对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挑战的变化。在此过程中，美国的军事战略一直在应对全球性威胁与区域性挑战，在有限的军事实力与战略重点之间寻求平衡。而美国的战略重点东移及其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则是这种平衡中一条日渐清晰的主线。

在应对全球性威胁与应对地区性挑战之间变动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特别是海湾战争的速战速决，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得以确立。作为对这一重大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反应，美国的军事战略也在发生重大的调整，即从“全球遏制”战略转向“地区防务”战略。而1993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切尼签署的《1990年代的防务战略：地区防务战略》，则是体现这种战略调整的标志文件。该战略报告声称，美国的战略已经从集中应对一个全球性威胁转向应对地区挑战和机遇，美国已经从遏制战略转向地区防务战略。……新的地区防务战略旨在使美国能够在塑造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维持和加强以高昂的代价才赢得的战略纵深。

在冷战结束的第一个十年，美国的军事战略重点关注和应对地区性挑战。进入新世纪后，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打破了这种局面。美国的军事战略从应对区域挑战转

向应对全球性威胁，打赢全球性反恐战争成为此后十年主导美国军事战略的焦点。2011年2月8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Mike Mullen)发布了《国家军事战略报告》。这份报告在一定意义上是美国实施新的军事战略调整的转折点。与发布于2004年的上一版有实质性更新内容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相比，2011年发布的报告有些显著的变化，突出表现为美国的防御目标更为广泛。具体而言，2004年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宣称美国的军事目标包括保卫美国、防止冲突和突然袭击、战胜对手及塑造军队；2011年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则宣称美国的军事目标包括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吓阻并击败侵略，加强国际与地区安全。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的军事战略报告不仅将加强地区安全作为美国的军事目标，而且还以较大篇幅阐述了亚太地区的安全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说，该份报告标志着美国的军事战略从应对全球性恐怖主义威胁向应对地区性挑战过渡，而亚太地区则成为美国的战略重点。

从“打赢两场区域战争”转向“打赢一场半区域战争”

“两场战争”的概念自1991年以来一直指导美国的军事战略。这一概念是由老布什时期的国防部长切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创造的，它最初设想美军可能同时与伊拉克和朝鲜作战。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维持足够的军力以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冲突”是美国强调的首要军事目标。1997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第一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重申，美国军队必须能够打赢几乎同时在两个战区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同时高度重视维持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以塑造国际环境并更好地应对各种小范围的紧急情况和非对称性威胁。

有研究披露，九一一事件前夕，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国防部已经决定放弃维持一支能够同时发动两场大规模战争的武装力量，代之以重组军队来适应远程、精确打击战争的需要。但是，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打乱了美国的这一军事战略转变计划，不仅如此，它还促使“两场战争”的概念从设想变为现实。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致力于尽快结束两场反恐战争。不过，可以理解的是，在美军从伊拉克彻底撤军之前，美国的军事战略仍以“两场战争”概念为指导。美国国防部2010年2月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此声称，“在中长期内，美国武装部队必须计划和准备好在一个大范围内的不同规模作战行动中获胜，这些行动可能会在相互重叠的时段内在多个战场上同时进行，包括战胜两个有实力的侵略国。不过，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对最大可能范围内的行动进行计划的必要性。这些行动发生在多重条件和未知条件下——从国土防御和对民间政府提供防务支援，到威慑吓阻和进行准备的使命。”

2012年1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美国新“防务战略指针”发布会上发表讲话认为，“美国必须有能力同时在几场冲突中作战。显然，我们对付的不是以往的威胁，我们正在应对的是21世纪的威胁。而这要求我们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以调动和部署军队，使其能够与任何地方的任何敌人作战并击败之。……但是，完全可以肯定，我们将具备同时与一个以上敌人对抗并取得胜利的能力。”同日出台的“防务战略指针”印证了他的这种说法。该“指针”宣称，“即便美国军队正在某一地区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它也有能力使另一地区的一个机会主义侵略者无法实现其目标，或使其付出无法接受的代价。”这意味着美国在冷战后形成的“准备打赢两场大规模战争”的军事战略发生了改变，转变成了“准备打赢一场半战争”。

美国将战略重点东移并强化对中国的战略防范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军事战略从“全球遏制”转向“地区防务”，其对亚太地区的重视也由此加强。美国国防部1993年1月发布的《1990年代的防务战略：地区防务战略》称，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具有重大的战略与经济意义。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部分别于1995年、1998年发表《东亚战略报告》和《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表明了当时美国在战略上对亚太地区的重视。

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重视日益表现为对中国的战略防范。2001年9月，美国出台第二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是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不到20天的时候面世的，它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九一一事件前美国的防务战略构想。该报告指出，美国的防务思想将从“基于威胁”的模式转变为面向未来的“基于能力”的模式。该模式更加注重敌人将如何作战——而不是谁有可能是敌人，或者战争会在哪里爆发。它还宣称，美国军队不仅要能打赢两场大规模的战区战争，还要能打赢一切可能的冲突，并提出美国全球军力部署的调整要考虑到应对新挑战，尤其是反进入(anti-access，又译“反介入”)与区域拒阻威胁。该报告强调要加大这方面的资金投入。鉴于美国国会通过的《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部递交有关中国军力发展的年度报告，以及2001年4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这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的“基于能力”的防务思想和所谓美国面临的“反进入与区域拒阻威胁”所针对的目标已经十分明显。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对付恐怖主义威胁。尽管如此，2005年3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国家防务战略报告》仍然强调，作为防务转型的重要内容，通过战胜美国在全球海上、空中、太空及网络空间面临的挑战，美军将自由进出全球公共领域。同时，美国将向反进入环境投送并维持军事力量。2006年2月，美国国防部出台其第三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该报告明确表示，所有大国和新兴国家中，中国是在军事上最有潜力与美国竞争并部署破坏性军事技术的国家，如果

美国对此缺乏应对之策，假以时日，美国的军事优势就会被抵消。2008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国家防务战略报告》则明确提出，中国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具有与美国竞争的潜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需要阻止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及其战略选择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报告认为中国很可能继续扩大其常规军事能力，强调发展反进入和区域拒止能力，其中包括发展各种远程打击能力和太空战、信息战能力。在2001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反进入与区域拒止能力即被视为是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但是，受反恐战争的牵制，美方一直在同类文件中对这一威胁的来源持模糊态度。而这份《国家防务战略报告》则明确表示这种威胁来自中国，发出了美国将把战略防范的关注重点转向中国的明确信号。

与这一战略动向相承接，2010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认为，中国军力发展和决策过程的不透明使美国对未来中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行为与意图充满疑问。该报告指出，美国空军和海军正在研究一种新的空海一体战作战思想，以在各种军事行动中击败敌人，包括具备尖端反进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敌人……以应对美国行动自由所面临的不断增加的挑战。在进行上述一系列铺垫之后，很显然，美军所酝酿的空海一体战的打击目标就是中国。2011年8月12日，美国海军上将乔纳森·格林纳特(Jonathan Greenert)、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瑟夫·邓福德(Joseph Dunford)以及空军上将菲利普·里德洛夫(Philip Breedlove)联合建立了“空海一体战”办公室(ASBO)。同年11月9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建立多军种协调办公室，这标志着美国的“空海一体战”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在奥巴马政府高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表题为《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美国国防的优先任务》的防务战略指针报告。该报告声称，“美国在继续致力于维持全球安全的同时，向亚太地区进行必要的再平衡。……从长远来看，中国崛起为地区大国将可能以不同方式影响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像中国、伊朗这样的国家将继续追求以非对称手段对抗我们的力量投送能力。与此同时，尖端武器与技术也将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相应地，美国军方将根据需要加大投入，以确保其在反进入和区域拒止环境下的行动的有效性。”至此，美国被反恐战争推迟了十余年的向亚太地区的战略重点转移终于正式浮出水面，而其对中国的战略防范与威慑则成为这一战略重点转移的主要动力之一。

概言之，美国的上述战略调整都是为了在威胁与应对手段、军事实力与战略重点之间寻求平衡。在此过程中，美国的战略重点东移及其对中国的战略防范成为一条日渐清晰的主线。

国防费、军队规模与武器装备：优势的维持与巩固

美国的国防费由国防部掌管的军费、能源部掌管的军用原子能项目经费和其他国防活动经费这三部分组成。美国武装部队由现役、预备役部队和文职人员组成。美国的武器装备则分为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两大类。它们都是美国军事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冷战结束之初，苏联威胁的消失和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善，促使美国国防部致力于推行削减国防费、军队规模及武器装备的计划。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始终强调维持美国军事实力的领先优势。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后，处于十年反恐时期的美国的国防费大幅攀升，军队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新式武器的研制、开发与采购更趋活跃，美国的军事实力进一步得到加强。但是，受金融危机、巨额财政赤字、伊拉克战争结束、阿富汗战争收尾的影响，自2012财年起，美国削减国防费、军队规模和尖端武器研发项目被提上了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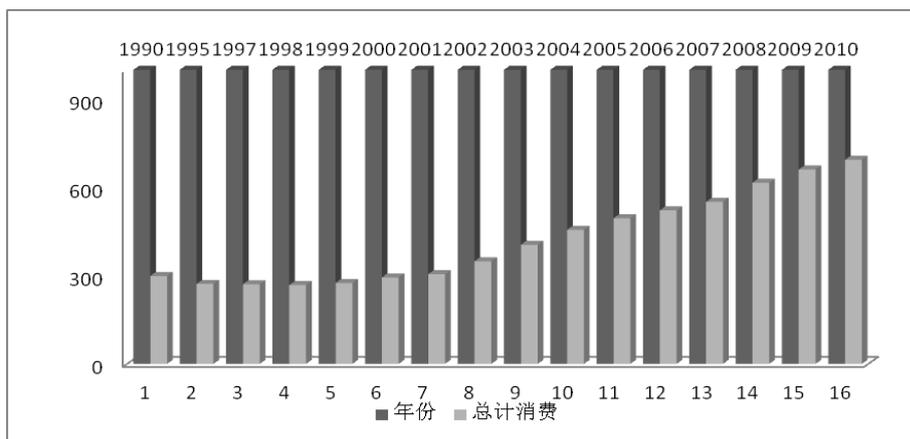
国防费

在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致力于实施军队结构和国防费削减计划。这一计划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冷战的结束，同时也缘于深刻的国内经济原因。早在1989年1月，因经济增长放缓和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增加，美国联邦政府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理查德·达曼（Richard Daman）就曾要求布什政府大幅削减1990财年预算案中的防务预算。

1993年1月面世的《1990年代的防务战略：地区防务战略》报告称，以新战略为指导，美国正在重组其军队以满足战略威慑与防御、前沿存在、危机反应及重建的根本要求。与此同时，美国大幅削减军队规模，军职与文职人员合计削减超过100万人。这种削减将把美国军队的结构削减至朝鲜战争爆发前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防费在GDP中的百分比也将降至自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以来的最低水平。该报告同时强调，即使我们从总体上削减军队规模的时候，我们也一定注意不要因粗心大意而损害了部队的质量或技术优势。……我们必须维持一支有能力的军队。

1993年出台的《全面评估：新时代的军事力量》报告也支持继续削减美国的国防费。受老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国防费削减计划的影响，在冷战结束后最初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国防费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2993亿美元，下降到1998年的2682亿美元（见图1）。

图 1 美国国防费变化情况 (1990-2010) (10 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援引美国国防部的资料

然而，从1999年开始，这种国防费下降的势头发生逆转。其原因之一在于，1999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防务预算增加了与提升C4ISR（即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及侦察）能力有关的新技术的预算要求。总体来看，在克林顿政府的第二任期内，美国的国防费有了1-2%的适度增长。这是因为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所授权的国防费总是高于政府的预算。这些增加的拨付款项多用于提高军人的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部队的备战状态、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应急行动、情报与信息技术、弹道导弹防御等。归根到底，是美国经济的增长为美国防务预算的提高提供了保证。由于经济的良好发展，美国经济所承受的国防费负担不断下降，国防费占GDP之比从1996年的3.5%下降到1999-2000年的3%。

2001年，由于美国遭受了恐怖袭击，布什政府先后发动了两场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这使得美国的国防费大幅增长。截至2010年，美国的国防费一直呈稳步上升之势，从1999年的2748亿美元大幅上升到2010年的6936亿美元。2011年，美国国防费为7246亿美元，其中常规军费为5482亿美元，战争特别预算1587亿美元，原子能项目经费177亿美元。2012年，美国国防费下降至6709亿美元，其中军费为5531亿美元。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2011预算控制法案》，未来十年内美国计划削减国防预算4870亿美元。

军队规模

出于与削减国防费相同的原因，老布什政府也致力于削减军队规模。在此背景下，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起草的《基本军队结构计划》应运而生。该计划拟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25%的军队规模。1993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莱斯·阿

斯平(Les Aspin)发表了《全面评估：新时代的军事力量》报告。该报告对美国的防务战略、军队结构、军事现代化、永久性军事设施及军事基地等进行了全面评估。美国的军队结构削减计划由此加快且超越了此前所计划的基本军队结构的限度，并导致自 1990 财年以来美军规模的全面削减，削减幅度大约是 1/3——大大超过在基本军队结构基础上 25%的削减计划。到 1993 年底，这些削减目标大部分已经达到了。1990-1995 年间美国军队结构的变化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美国国防部削减军队结构的程度（见表 1）。其中现役陆军结构的削减最为显著，削减幅度高达 1/3。美国的这一轮军队结构削减计划在 1996 财年趋于结束。此后，这一军队结构大体维持了下来。

表 1 1990-1995 美国军队结构的变化

类别	1990 年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陆军（现役）	18（师）	12（师）	10（师）	10（师）
陆军（预备役）	57（旅）	48（旅）	47（旅）	42（旅）
海军陆战队（现役）	3（师）	3（师）	3（师）	3（师）
海军陆战队（预备役）	1（师）	1（师）	1（师）	1（师）
作战舰艇	546（艘）	373（艘）	365（艘）	358（艘）
航母（现役）	15（艘）	11（艘）	11（艘）	11（艘）
航母（预备役）	1（艘）	1（艘）	1（艘）	1（艘）
空军联队（现役）	13（联队）	10（联队）	10（联队）	10（联队）
空军联队（预备役）	2（联队）	1（联队）	1（联队）	1（联队）
战斗机联队（现役）	24（联队）	13（联队）	13（联队）	13（联队）
战斗机联队（预备役）	12（联队）	8（联队）	7（联队）	7（联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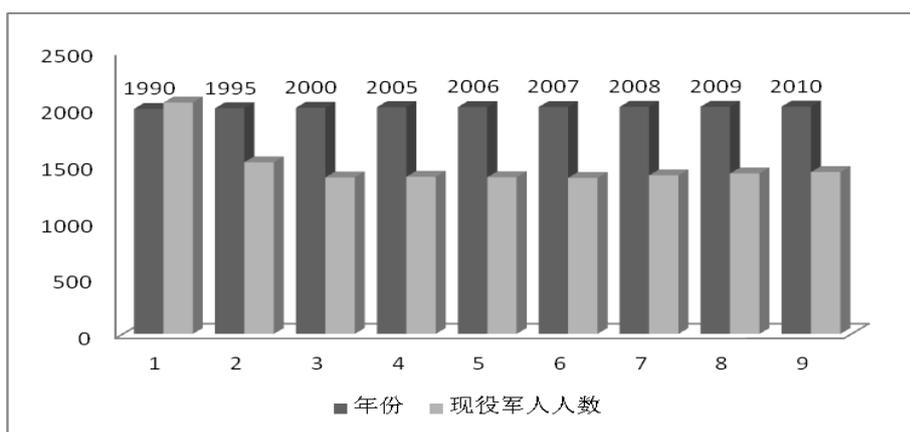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美国国防部网站（1996-97 财年国防预算）

到 2001 年，美国陆军拥有 10 个现役师，8 个国民警卫队师，1 个装甲兵团，1 个轻骑兵团，15 个加强独立旅（国民警卫队）；海军拥有 12 艘航母，10 个现役空军联队，1 个预备役空军联队，12 个预备役两栖战舰群，55 艘攻击潜艇，108 艘水面战舰，8 艘预备役战舰；空军拥有 46 个现役战斗机中队，38 个预备役战斗机中队，4 个预备役防空中队，112 架轰炸机；海军陆战队拥有 3 个现役师，1 个预备役师，3 个航空联队，1 个预备役航空联队，3 个现役后勤保障大队和 1 个预备役后勤保障大队。根据美国国防部 2004 年 3 月的一份报告，美国 2005、2007、2009 财年的军队结构计划基本保持不变，即陆军维持 10 个现役师，8 个预备役师；

海军维持 12 艘航母，10 个现役航母航空联队，1 个预备役航母航空联队，332-347 艘战舰；空军维持 10 个现役师；海军陆战队维持 3 个现役师和 1 个预备役师。

上述美国军队结构的变化与 1990-2010 年间美国现役军人数量的变化基本保持一致。具体地说，1990-1995 年间，美国现役军人人数明显减少，从 1990 年的 204.6 万人大幅下降至 1995 年的 151.8 万人。之后，美国现役军人人数继续下降，到 2000 年降至约 138.4 万人。2001 年之后，受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影响，美国现役军人的人数又开始逐渐增加，到 2010 年达到 143.1 万人（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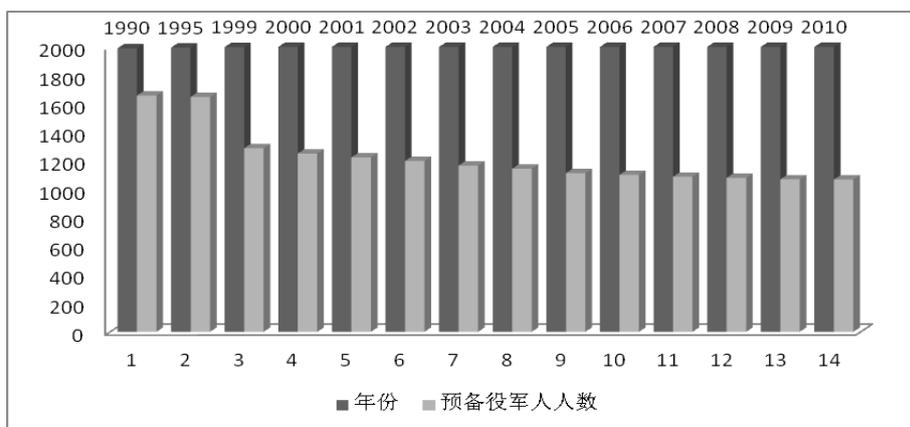
图 2 美国现役军人人数变化情况（1990-2010）（千人）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援引美国国防部的资料

而在 1990-2010 年间，美国的预备役军人人数则一直呈下降趋势，从 1990 年的 165.87 万人一直降到 2010 年的 106.89 万人（见图 3）。

图 3 美国预备役军人人数（1990-2010）（千人）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援引美国国防部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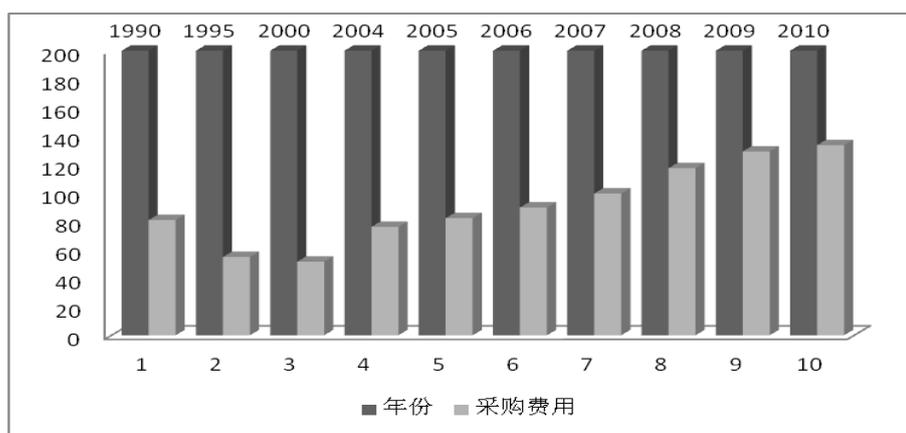
自 2011 年以来，由于面临大幅削减国防费的压力，五角大楼也计划削减美军现役部队的规模。根据《2013 财年国防预算案》，美军计划裁减 10 万现役部队，其中陆军裁减 8 万人，海军陆战队裁减 2 万人。这将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第二次大规模地削减军队规模。

武器装备

美军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武器库，包括陆地武器系统、海上武器系统、航空武器系统、太空武器系统、核武器系统、情报系统等，其中仅陆上武器系统就有 100 余种。在此采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分类标准，将美军的武器装备划分为战略武器、机动打击武器、远程投送武器及 ISTAR 武器四个种类，分别加以分析。

从资金投入来看，美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情况与国防开支中的军事采购费用和军事研发、试验与评估费用的增减密切相关。冷战结束之初，受美国国防费削减的影响，美国军事采购费和军事研发、试验与评估费也呈下降之势，其中军事采购费由 1990 年的 810 亿美元大幅下降到 2000 年的 517 亿美元。军事研发、试验与评估费则从 1990 年的 375 亿美元降至 1995 年的 346 亿美元。而到 2000 年，以现价美元计算，这一费用又增加到与 1990 年相当的水平，为 376 亿美元。2000-2010 年间，美国军事采购费也大幅增加，从 517 亿美元上升到 1336 亿美元（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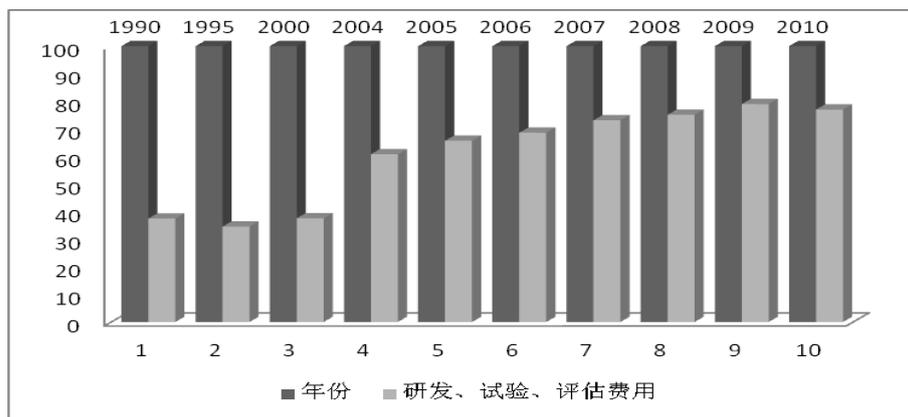
图 4 美国军事采购费用（1990-2010）（10 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援引美国国防部的资料

同期，美国军事研发、试验与评估费也总体呈增长之势，从 2000 年的 376 亿美元上升至 2010 年的 770 亿美元（见图 5）。

图 5 美国军事研发、试验、评估费用 (1990-2010) (10 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援引美国国防部的资料

从美军武器装备发展状况来看，总体上呈现出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并重、机动打击武器与远程投送武器协调发展以及 ISTAR 武器重点发展的特点。

战略武器 受 1991 年 7 月美苏《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 2002 年 5 月美俄《莫斯科条约》的影响，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削减（见表 2）。与此同时，美国战略武器性能的升级则更为引入注意。空军方面，1989 年，B-2 轰炸机首次试飞。1990 财年，美国国会为 B-2 项目拨款 20 亿，用于生产两种新机型。到 2006 年，运用新式 500 磅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一架 B-2 轰炸机能够全天候精确打击 80 个不同的目标。海军方面，2003 年，美国海军着手将 4 艘最古老的核弹道导弹潜艇改装成载有精确制导导弹的特种作战平台。改造后，它能够使参与行动的特种部队成员进入被拒止的区域，锁定重要任务并制定精确打击的目标，或者参与直接的行动任务，每艘潜艇能够搭载 150 多枚战斧式巡航导弹。此外，据美国科学家联盟核信息项目主管汉斯·克里斯滕森(Hans M. Kristensen)不久前披露，美国还将花费 60 亿美元对现有战术核武器进行升级。

表 2 1990-2010 年美国战略核力量的变化

年 代	1990	1998	2010
洲际弹道导弹/弹头	1000/2450	550/2000	450/2200
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31	18	14
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弹头	568/4864	432/3456	336/1750
轰炸机	324	87	155

数据来源：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编《军事平衡 1997/1998》第 13 页；《军事平衡 2011》第 469 页。

机动打击武器 冷战结束后，美军的机动打击武器在数量上呈削减之势，而在性能上则不断提高。陆军方面，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军的主战坦克数量大幅减少。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提供的数据，1991 年美国陆军大约装备 16500 辆坦克，2001 年则减少为大约 8000 辆，2011 年则进一步减少至大约 6300 辆。同样，1990-2010 年间美国战斗机与攻击机的数量也在削减，从 1990 年的 5962 架大幅减少到 2000 年的 3649 架，2010 年更减少至 3560 架。导致这种削减的主要原因是美方重视以高科技来提高武器性能。2004 年 9 月，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明确表示：“精确打击武器已经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能力，同时大幅削减了我们所需武器的数量。”

美军武器装备性能的提高突出表现在战术飞机不断更新换代方面，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发展是第五代战术飞机的研制与投入使用。近年来，美国空军正大幅削减老旧的第四代战机。不过，由于第五代战机过于昂贵，而国防部又面临着大幅削减防务预算的压力，美国国防部长在其提交的《2010 财年国防预算案》报告中提出停止生产 F-22 战机。根据相关研究，截至 2011 年，美国拥有 179 架第五代战术飞机、3029 架第四代战术飞机、6302 辆主战坦克、6452 辆现代装甲步兵战车、2809 架大/中型运输直升机、862 架攻击直升机、2163 门牵引炮、7500 门迫击炮、950 门自走火炮、1430 个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等具有机动打击能力的武器。

目前，美国正在加紧研制全球即时打击系统。2010 年，美军相继试射 X37B 型轨道飞行器和 X-51A 型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这标志着美国“全球快速打击系统”进入武器试验阶段。X37B 可携带 5400 公斤弹药，在 2 小时飞行 1.6 万公里。X-51A 则以 B-52 轰炸机为发射平台，对远程目标实施打击。

远程投送武器 远程投送能力是一国军力水平的重要体现，它主要表现在海军的航母、舰艇、空中加油机及运输机等武器装备的数量与质量上。在 1989-2009 年的 20 年间，美国海军的大部分武器装备都处于削减之中，其中包括航母、核动力攻击艇、巡洋舰、护卫舰以及两栖战舰等(见表 3)。与此同时，这些武器装备的更新改造也在进行之中。美国海军的远程投送武器依赖于对舰艇动力源的改进，而核燃料无疑是最为理想的动力源。目前，美国所有航母和潜艇都是以核燃料为动力的。此外，美国还曾建造了 9 艘核动力巡洋舰。另一方面，作为履行 1991 年《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的举措，美国政府同意削减战略导弹潜艇的数量，将海军的 18 艘三叉戟潜艇中的 4 艘改装成了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潜艇。这一改造无疑增加了美国海军的远程投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2001 年美国海军启动采购 55 艘濒海战舰计划，到 2008 年 11 月 1 日，第 1 艘濒海战舰被编入现役。重/中型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也是美军投送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这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十分显著。有关研究认为，截至 2011 年，美军拥有 11 艘航母、83 艘巡洋舰/

驱逐舰、28 艘护卫舰、57 艘核动力潜艇、29 艘大型两栖战舰、847 架重型/中型运输机和 550 架空中加油机/运输机等具有远程投送能力的武器装备。

表 3 1989-2009 财年美军投放力量变化情况

类别	1989 财年	1994 财年	1999 财年	2004 财年	2009 财年
巡航导弹潜艇	0	0	0	4	4
核动力攻击潜艇	96	88	57	53	53
常规攻击潜艇	3	0	0	0	0
航母	15	12	12	12	11
战舰	4	0	0	0	0
巡洋舰	40	35	27	25	22
驱逐舰	68	41	52	48	57
护卫舰	100	51	37	30	30
濒海战舰	0	0	0	0	1
两栖舰	65	42	41	37	33

数据来源：《冷战后美国的海军战略及其兵力结构》（2011）

ISTAR 武器 ISTAR（即情报、监视、目标搜寻与侦察）武器体现了一国军队进行信息战的能力。1997 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调整防务战略并实现军事力量的转型，同时强调超级信息能力和其他先进技术的重要性。该报告支持以“2010 年联合构想”指导美国的军事转型。“2010 年联合构想”提出，未来美军将实现在战场上赢得“全频谱优势”的目标。所谓“全频谱优势”的核心含义就是能够收集、处理、传播对美军至关重要的信息，同时阻止对手获取并使用情报的机会。美国政府《1999 年的国防预算案》支持“2010 联合构想”的主张，加大了对新技术的投资力度，由此加快了美军获取新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侦察（C4ISR）能力的速度。

美国国防部 2001 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强调加大投资力度发展 C4ISR 能力。2006 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则决定加快购买“捕食者”无人机和“全球鹰”无人机，以使无人机的覆盖能力倍增。同年 11 月 9 日，美国空军在内华达克利奇空军基地组建以“捕食者”装备的攻击航空中队。2010 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再次呼吁加大对 C4ISR 和电子攻击能力的投入。截至 2011 年，美军已经拥有 104 架空中预警与控制飞机，370 架重型无人机，10 颗成像卫星，20 颗电子信号情报卫星，31 颗导航卫星等情报与信息类武器，在 C4ISR 能力方面独具优势。

海外军事存在：收缩还是加强？

海外军事存在是美国军事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海外军事基地和设施、海外驻军及武器部署等多种形式呈现。美国海外基地委员会认为，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是骨骼，美军的作战能力是肌肉，前者将后者塑造成型。海外军事基地对于美军实力与作战能力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美国一直在全球维持着庞大的基地群。有关研究认为，截至 2009 年，美国在全球的海外军事基地（包括军事设施）大约有 1000 个（五角大楼的官方数据是 865 个，其中不包括美国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基地和设施），包括在德国的 268 个、在日本的 124 个和在韩国的 87 个。美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分属其太平洋司令部、欧洲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北方司令部、非洲司令部及战略司令部掌管。

冷战结束后，针对海外军事基地，美国曾两度推行重大的调整计划。第一次是 1990 年代初裁减海外驻军；第二次是从本世纪初开始，扩大美军在中东、中亚及非洲的军事存在和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1990 年代初，冷战的结束推动美国大幅削减海外驻军。在欧洲，美国驻军从 1989 年的约 326400 人下降到 1994 年的约 159600 人。其中驻德美军由 1989 年的 242800 人下降到 1994 年的 103200 人。同期，美国驻亚太一些国家的军事人员也以较大幅度减少。其中驻日美军由 50800 人下降到 44800 人，驻韩美军由 44200 人下降到 36250 人。美军撤出菲律宾基地虽不属于美国国防部按计划进行的海外驻军削减，但的确使当时驻亚太美军人数的削减幅度更为可观。1990 年美军驻菲军力约为 14700 人，由于 1991 年美国与菲律宾在租用基地费用问题上发生分歧，加之同年 6 月 9 日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喷发，导致克拉克空军基地部分设施严重受损，促使美方决定放弃该基地。1991 年 12 月 6 日，菲政府通知美方在一年内撤出驻菲美军。1992 年 11 月 24 日，最后一批驻菲美军撤出，美菲关系也因此一度降到谷底。直到 2001 年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之后，两国的军事关系才得以逐渐恢复。

美国的第二次海外军事基地调整从表面上看似乎也以裁减驻军人数为主。此次裁减始于 2004 年 8 月布什总统在辛辛那提发表的讲话，他说：“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的防务态势也应该随之改变。”他建议未来 10 年内美国从欧洲和亚洲撤出 7 万驻军，但截至 2010 年，这一建议并未得到有效实施。

美国这两次海外驻军裁减计划的成效可以从以下一组数据中得到更为清晰的体现（见表 4）。从表 4 中可以看出，美国海外驻军人数从 1990 年的 60.9 万骤降到了 1995 年的 23.8 万。这期间，美国本土驻军人数也有明显下降。2005 年，美国海外驻军的人数为 29.1 万，2010 年则为 29.7 万。显然，经过了 5 年，美国海

外驻军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实际上，驻日美军从2004年的约43550人下降到了2010年的约35598人；同期驻韩美军则从约34500人下降到了约25374人。由于美国借反恐战争之机加强了在中东、中亚以及非洲的军事存在，对这些地区增派的军事人员从数量上弥补了美国在日、韩减少的驻军人数。

表4 1990-2010年美国在本土和海外驻军变化情况(千人)

年份	1990	1995	200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本土	1437	1280	1127	1098	1100	1085	1113	1156	1134
海外	609	238	258	291	285	295	289	263	297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援引美国国防部的资料

另外，2005至2010年间，美国本土驻军人数也有明显增加。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美国陆军的规模不断扩大。这期间，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也处于调整之中。大批驻欧美军被频繁派往伊拉克、阿富汗战场。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共有54000名美军被派往伊拉克参战。2006年，将要动身前往这两个战场或刚从这两地返回的驻欧美军人数达到当时驻欧美军总人数的2/3。这种变动对后来奥巴马政府的海外基地调整计划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美国对其海外军事基地的调整是以强化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加强关岛军事基地的军力部署为目的的。进入新世纪，美国的军事战略重点已经显示出向亚洲倾斜的迹象。2001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将增加在西太平洋的航母战斗群，增加3至4艘水面战舰和载有精确制导巡航导弹的潜艇，增设应急基地，并探讨加强对海军陆战队的培训，以应对西太平洋沿岸的战事。2006年3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又提出，美国海军舰队将扩大在太平洋的存在，以便与全球贸易和交通的转移保持一致。相应地，美国海军计划调整其力量部署，向太平洋地区提供至少6艘既能作战又能持续停留的航母和60%的潜艇。

美国加强西太平洋军事存在战略的主攻方向是加强关岛军事基地的军力部署。海军方面，2001年初，美国海军宣布将在关岛停泊三艘核动力攻击潜艇。次年，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进驻关岛。到2007年，关岛基地拥有三艘核动力攻击潜艇的目标得以实现。2008年，美国海军计划在阿普拉海军基地为一艘航母提供泊位，频率是一年三次，时长是每次三个星期。空军方面，2003年3月，一支新编远征航空联队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开始服役。随后，为了准备对伊拉克的战争，美军B-1和B-52轰炸机分别从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空军基地前往安德森空军基地换

防。此后，美国空军开始不断向关岛部署战机。2004年2月，第一批B-52轰炸机被部署在安德森空军基地，该型号轰炸机能够携带20枚常规空射巡航导弹。2005年4月，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透露，安德森空军基地开始有B-2隐形轰炸机飞行。当月，来自爱达荷州的F-15战斗机也在安德森空军基地临时部署。2006年，有美国空军军官透露，美国空军计划在关岛部署KC-135空中加油机。2007年，美国空军宣布，18架F-16战斗机将部署在关岛，为期四个月。2008年夏，数架F-22战斗机离开阿拉斯加空军基地前往关岛基地驻守。此外，安德森空军基地还首次计划到2009年前为其情报、监视、侦察（ISR）特种打击部队配备4至6架RQ-4“全球鹰”无人机。驻军方面，2006年5月，美日两国签署了扩大军事合作的“路线图”，其主要内容是将驻冲绳的第三海上远征军司令部和8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迁往关岛。

在亚太其他地区，美国也采取行动加强了其军事存在。在澳大利亚，2004年7月8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宣布，美澳将建设“联合培训中心”。在韩国，为了弥补驻军的削减并继续在朝鲜半岛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美方拨款110亿美元用于提升驻韩美军的作战能力，其中包括部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阿帕奇直升机、无人机及情报、监视、目标搜寻与侦察（ISTAR）武器装备。此外，在2004年7至9月间，美军将新墨西哥好莱坞空军基地的F-117“夜莺”隐形轰炸战斗机飞行中队部署到了韩国昆山空军基地。

近两年来，随着美国结束在伊拉克的反恐战争，并逐渐削减驻阿富汗美军，美国开启了新一轮海外军事存在调整计划。在这次海外军事基地调整中，欧洲再次成为削减的对象。2012年1月26日，美国国防部宣布了裁减驻欧美军的计划：美国陆军将在2012、2014财年分别撤销驻德国的第170和第172步兵旅；将驻欧美军从现在的约8万人减少到2017年的约7万人；撤销美军驻德国威斯巴登的第5军司令部；将驻欧陆军司令部从德国的海德堡迁往威斯巴登；撤销驻德国斯庞德海姆空军基地的美空军第81飞行中队；撤销驻意大利阿威安诺空军基地的美空军第603航空控制中队；将驻德国的第173航空旅作战分队迁往意大利的维琴察。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下，美国将继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在关岛，美国继续推进其加强关岛军事基地的计划。2010年9月，第一架RQ-4“全球鹰”无人机被部署在关岛基地。安德森基地还计划在2017年部署MQ-4C“广域海上监视海神”无人机。同年，三艘俄亥俄级精确制导弹潜艇驶入太平洋，并依靠关岛基地为其提供后勤支持。2012年6月，5艘洛杉矶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和1艘俄亥俄级核动力精确制导弹潜艇汇聚关岛，接受修理和维护。同年4月，美、日两国就将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迁往关岛的计划达成一致。根据该计划，大约9000名海军陆战队

队员将离开冲绳，其中大约 5000 人被调往关岛，其余人员将被安置在太平洋地区其他美军驻地，如夏威夷和澳大利亚。调防计划完成后，仍将有 10000 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继续驻扎在冲绳。预计这次调防将耗资 86 亿美元，根据协定，日方将承担其中的 31 亿美元。

截至 2011 年 3 月，美国国防部提出的有关韩国、日本和关岛的计划将对成千上万驻守前沿的美国军人产生影响，此类计划要求新建上百个军事设施和 3500 多栋住宅。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估计，最早到 2020 年，驻韩国的美国国防部所属人员将从约 56000 人增至 84000 人，驻关岛的美国国防部所属人员将可能从 15000 人增至 39000 人。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还重新修建、修复了位于蒂尼岛的北场空军基地的 800 英尺跑道。该基地曾长期被弃用，是二战时期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 B-29 轰炸机起飞的地方。同时，美国还加强了与其他一些亚太盟国的关系。2011 年 6 月 4 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宣布，美国将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舰，并加强美新两国在军事培训与军事行动方面的合作。同年 11 月 16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宣布，自 2012 年年中开始，每六个月美国会派遣 200 至 250 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到澳大利亚调防。几年后，美国驻澳海军陆战队人数将达到 2500 名。目前，美国的这一轮海外军事基地调整与海外军事存在加强计划还在进行之中。

总体来看，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其海外军事基地的调整是规模收缩与实力加强并行，而亚太地区则逐渐成为其强化海外军事存在的重点所在。■

不温不火的复苏：2012 年的美国经济

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 谢来辉

【内容提要】 2012 年，美国经济继续步履蹒跚地走在复苏的进程当中。虽然消费者的信心和支出有所上升，但是外部出口环境依旧恶劣，企业投资依然低迷不振，美国经济对政府开支的依赖仍然较为严重。美国最初的金融问题已经明显转化为结构性危机，失业率一直在 8% 左右居高不下。虽然 9 月份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但是奥巴马连任之后能否在年底就“财政悬崖”问题与共和党主导的国会达成一致并制定解决方案，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之下。但是，也要看到美国的企业和家庭已接近完成去杠杆化过程，消费和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形成之中，美国经济对政府支出的依赖也在不断减少。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在形成。所以，如果美国能够顺利克服财政悬崖的不确定性影响，其经济复苏进程有望在 2013 年加速。

2012 年的美国经济仍然行进在从金融危机的重创之下逐步复苏的过程中。虽然这种复苏的过程不温不火，非常缓慢，但是与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停滞不前甚至仍旧不断衰退的状况相比，美国经济的增长还算是亮点。2012 年第二季度的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奥巴马上任前的 2008 年第四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高 5.2%。美国在 2012 年 9 月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的失业率为 7.8%，与 2009 年 1 月持平。也许是对这一成绩的认可，2012 年 11 月，奥巴马竞选总统成功，从而获得连任。但是他承认，美国经济要从危机中完全恢复，还需要数年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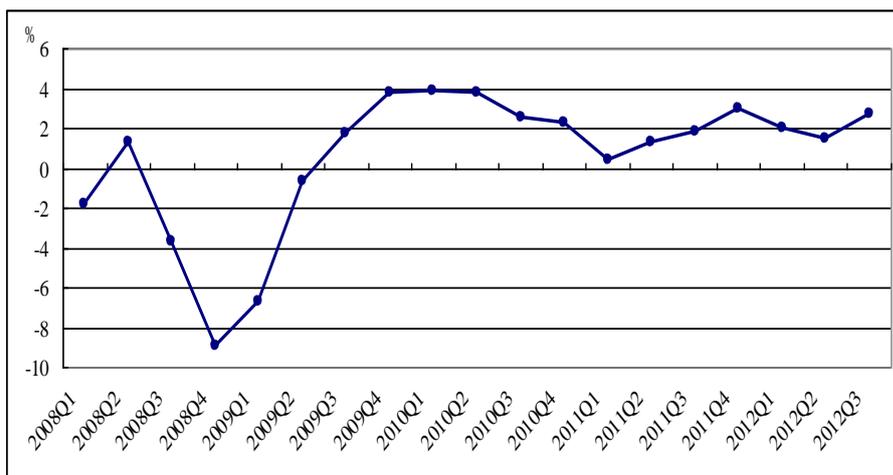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这种缓慢的恢复过程与这场堪比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危机的性质有关。与以往的经济衰退相比，这次危机从最初的金融市场危机转化为一场结构性危机。这特别表现为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连续 43 个月都在 8% 以上。因此，2012 年 9 月，美联储宣布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QE3)，并宣称将维持当前的极低水平利率直至 2015 年年中，以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从目前已经公布的 3 个季度的 GDP 增长率来看，2012 年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会略微超过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 2012 年 10 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美国

2012 年和 2013 年的增长率分别为 2.2% 和 2.1%。

2012 年美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

2012 年的美国经济增长呈 V 字形 (见图 1) , 虽有波折, 但可谓有惊无险。进入 2012 年之后, 美国经济并没有延续 2011 年第四季度高达 4.1% 的增长势头, 而是下挫到 2%, 第二季度进一步下滑到只有 1.3%。进入下半年后, 美国经济增长重新恢复到较高水平, 特别是在 9 月 13 日美联储宣布了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加快了增长速度。美国商务部 11 月 30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 第三季度美国 GDP 增速的修订数据为 2.7%, 高于 2.0% 的初步发布值(和市场预期)。GDP 增速超出预期的主要因素是企业库存增速加快, 且国防开支的增速仍然很快。另据报道, 美联储在 2012 年 11 月 28 日发布了基于 12 个辖区工商界和经济学家调查的经济形势黄皮书。黄皮书显示, 10 月至 11 月美国经济的增速较为稳健。由此也许可以认为, 第四季度的美国经济增长基本能够延续第三季度的势头, 2012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可望超过 2%。

图 1 2008 年以来美国经济复苏走势 (季度)



(注: Q 代表季度, 下同。)

数据来源: 美国经济分析局

2012 年 7 月 3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的报告认为, 当前美国经济增长“不温不火”。该报告认为, 虽然美国经济去年下半年曾出现反弹, 但今年上半年的增速降至 2% 左右, 就业市场回暖速度放缓, 对外出口也因外部需求下降而受阻。因此, 总体而言, 美国经济复苏依然疲软。

美国经济缓慢复苏的代价是巨大的。当前的这场复苏始于 2009 年下半年，但经济增速一直疲软。2010 年的美国 GDP 增长率为 3%，2011 年为 1.7%。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最近这次衰退，即在 1947 年至 2007 年的 60 年间，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速是 3.4%。尽管美国经济在 1977 年至 2007 年这后 30 年间的增长或多或少地慢于之前的 30 年，但其平均增速也达到了 3%。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的研究，在从 2009 年下半年至 2011 年的复苏阶段，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为 2.4%，比前面提到的两种历史长期趋势水平 (3.4% 和 3%) 都要低。这意味着，美国目前的经济产值比 2007 年以来在维持趋势增长水平的情况下本来可以达到的产值少了 12%。今天的美国经济产值与趋势水平的差异，比 2009 年第一季度美国政府启动近 9 千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时又扩大了四个百分点。如果事实证明 2012 年 2% 左右的增长率预测是准确的，那么这一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

当然，这一估算可能带有误导性，因为正是导致金融泡沫产生的那些因素推高了 2007 年全球的 GDP。然而，即便 2007 年的 GDP 被人为推高了 5%，如今美国和欧盟的产出仍然比应有的水平低 1 万亿美元左右，分摊到每个家庭相当于逾 1.2 万美元。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 认为，在大多数工业化经济体中，最初的金融问题目前正在转变为结构性问题。这在美国的经济复苏进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一缓慢复苏的进程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很有可能因为 2013 年 1 月的“财政悬崖”而中断，美国经济甚至会因此而重新陷入新的衰退。这就像头上高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美国国会两党的极化导致局面有恶化的可能，也使全球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面临极大的风险。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已经对美国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明显的实质性影响。

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

具体来说，2012 年美国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和净出口一直低迷，以及消费虽明显增长，但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根据宏观经济统计的计算公式，作为经济增长总量标志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个人消费支出、投资、净出口以及政府支出四个部分加总而成的。从 2012 年前三个季度的数据 (见表 1) 来看，美国经济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增长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消费一直在引领增长，但是有明显减速的趋势，其中对服务的消费上半年表现较为突出。其次，投资相对而言较为低迷，而且波动较大。更具体的分析发现，前两个季度固定投资明显增长，但是存货投资却有所下降，进入第三季度后出

现逆转，存货增加，成为投资增长的主要拉动力。第三，净出口增长微弱，主要表现为进口增长较快，但第三季度的进出口都明显减速。第四，除了第三季度联邦政府的国防支出有明显增加之外，其他时间联邦及各级政府的支出一直都在下降，抵消了增长。

表 1 2012 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平均值
GDP 增长率	2	1.3	2.7	2
居民消费支出	1.72	1.06	0.99	1.26
国内私人投资	0.78	0.09	0.86	0.58
净出口 (出口-进口)	0.06	0.23	0.14	0.14
政府支出	-0.6	-0.14	0.67	-0.02

(注：表中数字为百分比/%，年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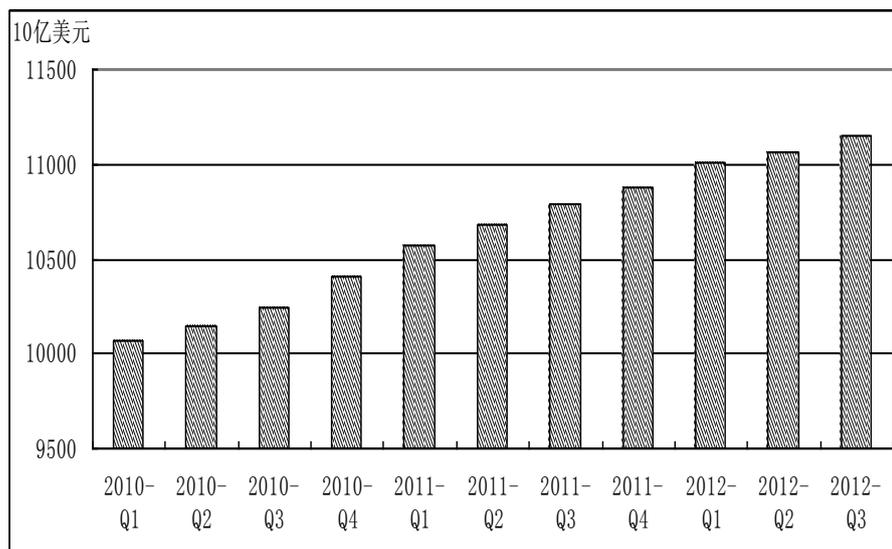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不过表 1 的数据也表明，美国实体经济在失衡纠正过程中的内生动力有所增强。2012 年前三季度，美国 GDP 季均增长 2%。其中，个人消费的季均贡献为 1.26 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危机期间的 0.53 个百分点，62.83% 的贡献率也接近了历史平均水平（65.89%）；投资平均贡献为 0.58 个百分点，接近历史平均的 0.63 个百分点，其中在房市触底回暖的支持下，住宅投资季均贡献 0.31 个百分点，高于危机期间的平均水平（-0.24 个百分点和 0.1 个百分点）；贸易平均贡献为 0.14 个百分点，低于危机期间的 0.28 个百分点，但略高于历史平均水平；政府支出平均贡献 -0.02 个百分点，明显低于历史水平（0.57 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2012 年美国经济的引擎分布正在向消费为主、投资为辅、贸易和政府减弱的方向转变。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内生动力明显增强。

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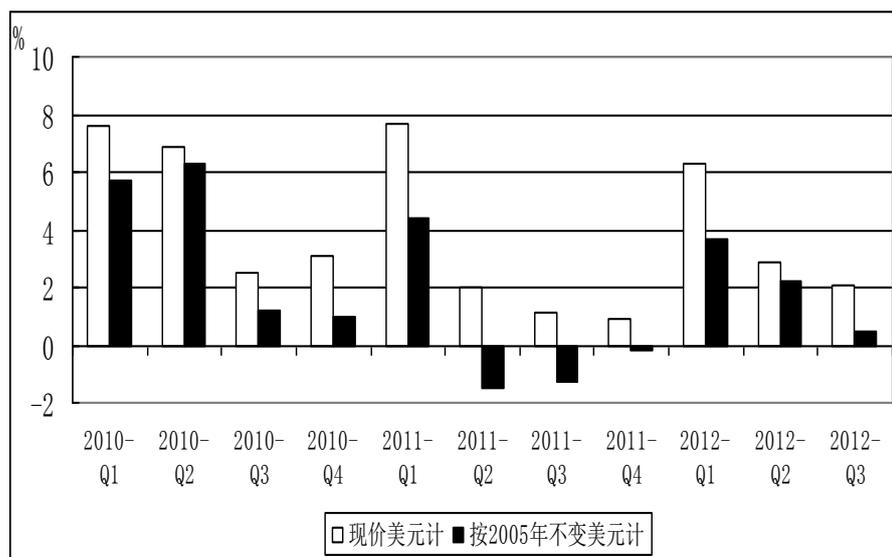
如前所述，消费稳定增长（如图 2 所示）是推动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之一。其增长主要受益于以下因素：（1）收入增长趋于稳定；（2）信贷增长有所提高；（3）杠杆化水平已经降低；（4）房地产市场正在改善。从物价水平方面看，全年通胀水平整体适度。截至 2012 年 10 月份，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美国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为 2%，与美联储设定的 2% 的警戒线持平。

图2 2010年以来的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季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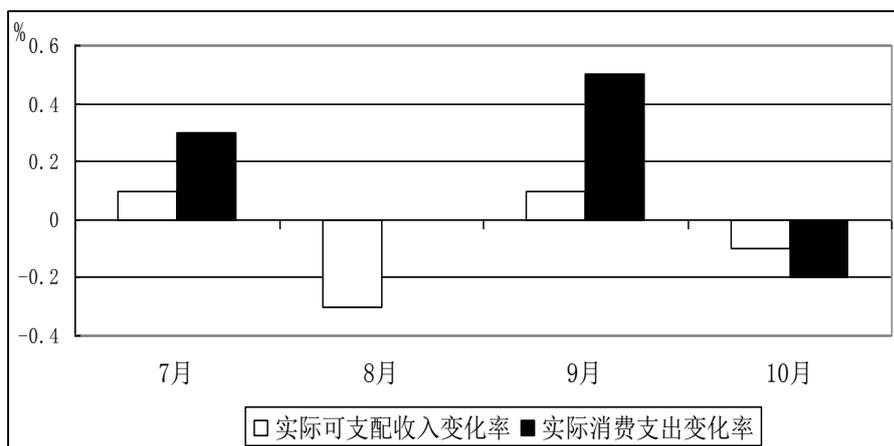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

在2012年的前三个季度里，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但是增速却在下降（图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第三季度以后，实际可支配收入和实际消费支出都出现了下降（图4）。在居民消费增长方面，相关影响因素（如就业、财政政策以及制造业复苏）非常复杂。

图3 2010年以来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变化趋势
(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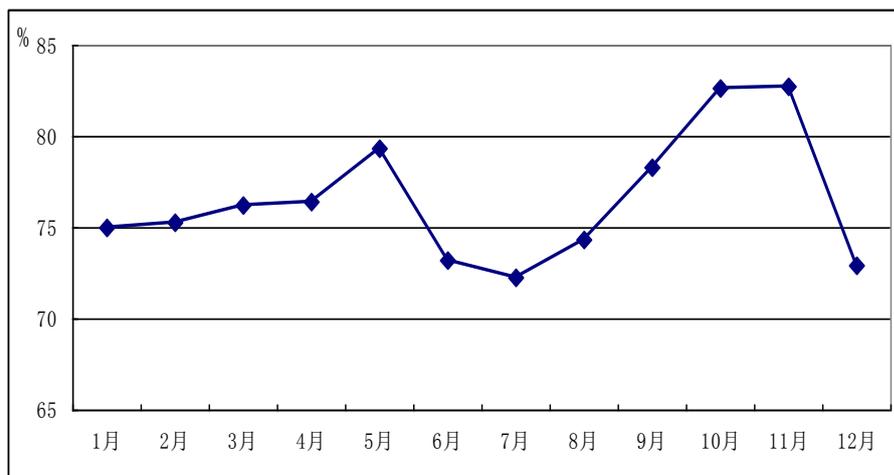
图4 近期美国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和实际消费支出变化率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另外，这种稳定增长的趋势也体现在2012年消费者信心的总体上升上。作为显示美国经济周期的重要指标，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12年总体维持上升趋势（除了在6月份下降了6个点）。其中，10月份的指数为82.6，为2007年9月以来的最高值。不过，该指数在12月下跌幅度为8个点，下降到74.5，扭转了上升势头（图5）。这或许反映了美国消费者对“财政悬崖”代表的经济发展方向不确定性的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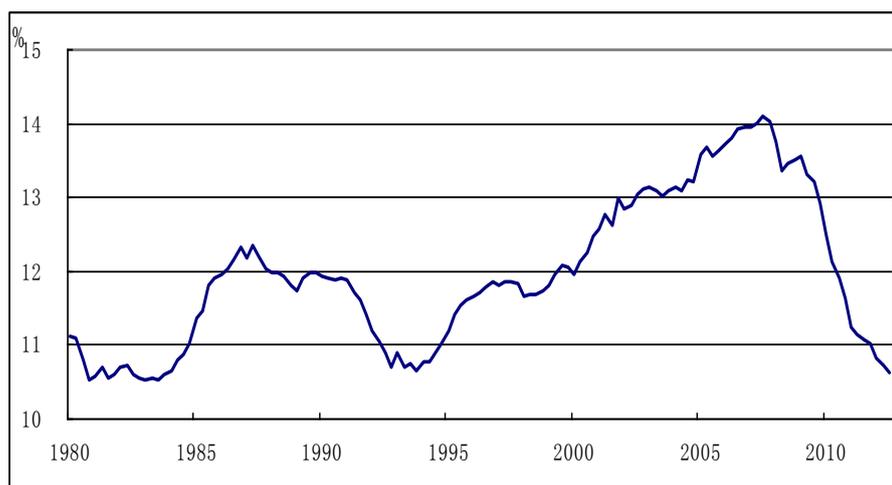
图5 2012年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



数据来源：Thomson Reuters/University of Michigan.

不过，从长期来看，美国居民消费的增长可望趋于稳健。去杠杆化是此次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复苏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这项指标对于分析美国未来的长期消费增长非常有意义。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第3季度美国家庭债务偿付数额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已经接近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见图6）。这说明美国家庭已经基本从引发金融危机的债务当中恢复过来，这为长期稳定的消费增长奠定了基础。

图6 美国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支付债务的比例（1980-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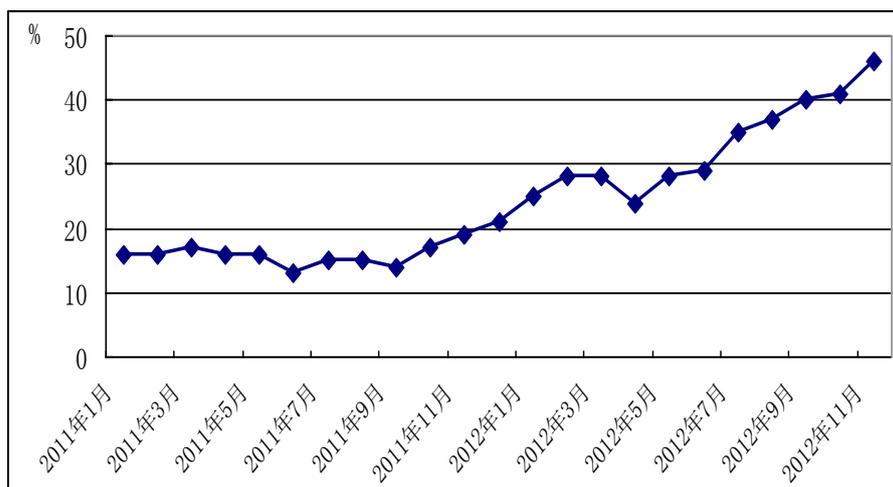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美联储，<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房地产市场是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亮点

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是推动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房地产投资除对GDP有直接贡献外，还能通过改善就业来提振消费。同时，房地产市场的持续活跃有望推动房价上涨，改善居民的资产状况，增强消费者的信心。

从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NAHB）发布的房产市场指数（Housing Market Indicators, HMI）（图7）来看，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恢复到了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2012年11月的HMI指数为46，相当于2006年5月的水平，接近46.97的历史平均水平。2012年前11个月的HMI平均值为33，大大高于危机期间的平均水平（最高值为20。2008年至2011年期间的均值仅为16）。2012年的前10个月，美国新房销售和现房销售环比增长率的月均值分别为0.87%和0.98%，既高于危机期间的-0.58%和0.48%，也高于历史平均的-0.05%和0.15%。特别是美国9月份新屋开工建设量显著上升，创下自2008年7月以来的最快增速。9月份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年化调整后新屋开工数升至87.2万套，增幅为15%。

图7 2011年以来美国房地产指数(HMI)变化趋势
(截至2012年11月)



数据来源：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 (NAHB)

2012年的美国住房市场回暖。成屋销售上半年出现恶化，下半年逐渐好转，但全年总体成屋销售量在波动中有所增加。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主体是成屋市场，而成屋市场的库存与销售的比值从2010年7月以来一直在下降。2012年全年成屋库存总体呈现下降之势，库存压力继续得到释放。全年成屋价格(尤其是上半年)呈现上升之势，成屋市场销售状况有所改善。新屋销售方面，经季节调整后2012年新建房销售量振荡上升，而新屋平均售价仅在6月出现大幅度下跌，全年价格总体稳中有升，尤其是9月美联储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后，价格上升幅度增加。此外，2012年前三季度美国住房市场出租空置率和出售空置率双双出现下降，住房自有率略微上升，全美房屋居住单元数量逐步上升。营建许可方面，已获得批准的新建私人住宅数目全年呈波动上升之势，新屋开工也是稳中有增。由于美国资金市场的紧张状况得以缓解，以及美联储采取了定量宽松政策，与住房市场密切相关的抵押贷款市场今年的表现亦有所好转，房贷利率总体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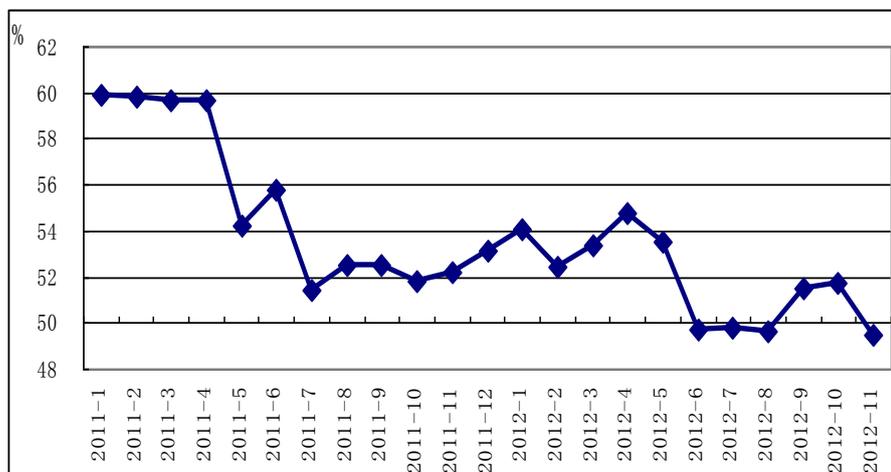
总体而言，无论从房屋价格还是销售数量、房贷利率来看，2012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都相比于2011年有所好转。消费者信心逐步恢复、居民投资增加，是房地产市场回暖的重要推动力量，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增长。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罗杰·奥特曼 (Roger Altman) 乐观地认为，“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反转，它应该会在2015年再现繁荣。房地产繁荣再加上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不断增长以及其他因素，将足以提振整个美国经济。实际上，由此导致的美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高于美联储提出的2%到2.5%的长期增长预期。”

制造业总体扩张，但明显减速

制造业是本轮美国经济复苏的亮点，也是美国政府着力提振经济的主要领域之一。制造业约占美国经济的 12%，在出口中占有最大的份额，对拉动就业具有重要影响。在过去的两年内，美国制造业持续增长，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是首次，在此期间就业人数增加了 40 万。

2012 年，美国制造业总体仍在扩张，但是扩张的速度明显放慢。从美国供应链管理学会(ISM)发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来看（见图 8），2012 年大部分时间该指标均在 50 上方。大部分地区的产出和订货均有所增加，服装、机械设备、石油及煤炭产品等行业一直处于扩张之中。但是在 6 月份，制造业结束了连续 34 个月的扩张，PMI 降为 49.7，出现了自 2009 年 7 月以来的首次萎缩。不过 9 月份的 PMI 又回升至 51.5，因为服装和初级金属等 11 个行业实现了扩张，从而结束了连续 3 个月的萎缩状态。10 月份的 PMI 升至 51.7，但好景不长，11 月的 PMI 意外降至 49.5，为 3 年多来的最低水平。当然，从其他类似的地方性制造业指数(比如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以及芝加哥 PMI 等)来看，2012 年美国制造业震荡走低的趋势更加明显。

图 8 近两年美国制造业指数 PMI 的变化趋势
(截至 2012 年 11 月)



数据来源：<http://www.ism.ws/ismreport/content.cfm?itemnumber=107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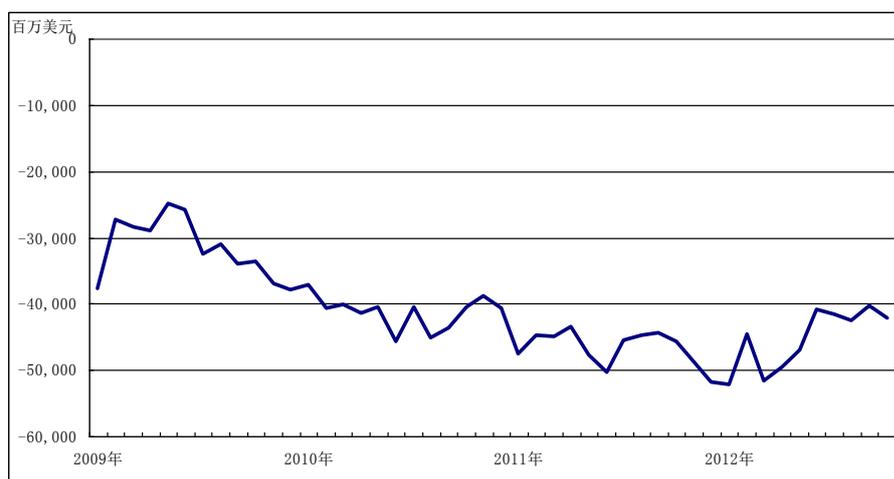
国际贸易微弱增长，贸易赤字继续下降

2012 年，国际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为 0.14 个百分点，低于危机期间的 0.28 个百分点，但略高于历史平均水平。欧债危机等外部环境因素是束缚美

国经济复苏的重要障碍之一，尤其表现为不利于贸易的增长。

自 2012 年以来，美国贸易赤字基本上呈现下降态势（见图 9）。1 月份的贸易逆差为 526 亿美元，由于出口增幅大于进口，到 9 月份缩窄至 415 亿美元，为 2010 年 12 月以来的最低点。

图 9 美国经常账户余额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具体来看，2012 年上半年，美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势头强劲，但第三季度的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服务贸易一直稳定增长，也一直产生顺差；商品贸易波动较大，但是出口增长速度在 2012 年一直稳定地高于进口增速（详见表 2）。

表 2 美国国际贸易的贡献分解（%）

类别	2011Q1	2011Q2	2011Q3	2011Q4	2012Q1	2012Q2	2012Q3
出口增长率	5.7	4.1	6.1	1.4	4.4	5.3	1.1
其中，商品	3.99	2.58	4.33	4.14	2.89	4.92	0.17
服务	1.73	1.51	1.79	-2.7	1.49	0.33	0.93
进口增长率	4.3	0.1	4.7	4.9	3.1	2.8	0.1
其中，商品	4.32	-0.58	2.51	5.2	1.68	2.4	-0.84
服务	-0.06	0.69	2.15	-0.27	1.41	0.38	0.95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November 29, 2012.

非传统能源开发有利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近两年美国以页岩油气为代表的非传统能源开发,正在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它对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大于其短期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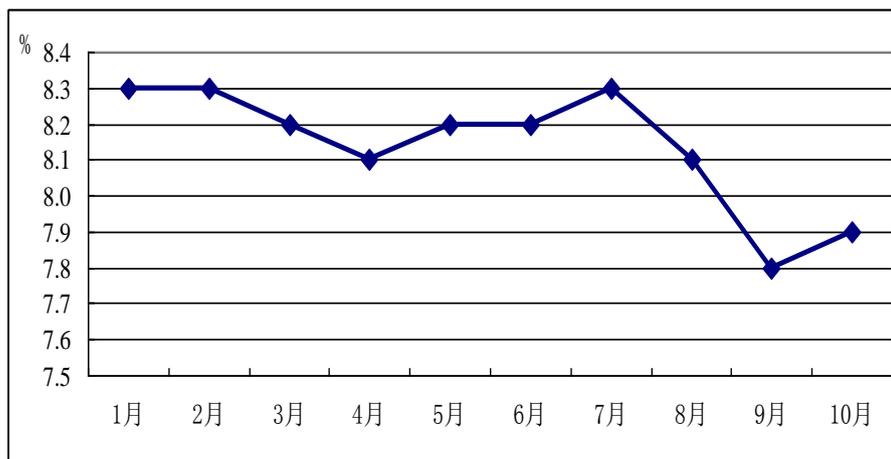
页岩油气开采技术的突破与推广带来产量的井喷式增长,使美国能源的外部依存度下降,并可能使美国未来成为能源净出口国。美国天然气协会 2011 年 12 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到 2015 年,页岩油气行业将为美国贡献 1180 亿美元的 GDP,并创造 80 万个新就业岗位。国际能源署(IEA)在 2012 年 11 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称,美国会在 2015 年超越俄罗斯,成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在 2017 年将超越沙特,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产油国。IEA 表示,得益于石油、页岩油气和生物能源产量的不断上升以及运输燃油效率的提高,到 2035 年,美国将能够实现石油自给自足。IEA 在报告中还预测,美国的石油繁荣将加速国际石油贸易的转向,预计到 2035 年中东生产的石油约 90%都将流向亚洲。

不过,对于页岩油气的繁荣,伯恩斯坦研究公司(Bernstein Research)的资深分析师贝弗里奇(Neil Beveridge)及其同事并没有这么乐观。在他们看来,美国石油产量的触顶时间要比上述 IEA 预测的时间来得更早,下滑速度也会更快。他指出,“到 2015 年,我们预计美国石油日均产量接近 1050 万桶。这将足以和沙特的产量相媲美,但这只能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到 2020 年,我们预计美国石油产量将跌回每日 900 万桶。”与此相对比,IEA 预计美国石油产量一直保持增长,2020 年达到每日 1110 万桶,2025 年产量才开始下跌。

失业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高位

尽管美国经济明显复苏,但其失业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2012 年,美国失业率在波动中下降,第二季度一度小幅上升,随后这一趋势逆转,并在 9 月份降到历史性的低位,仅为 7.8%,但在 10 月份又小幅升至 7.9%(见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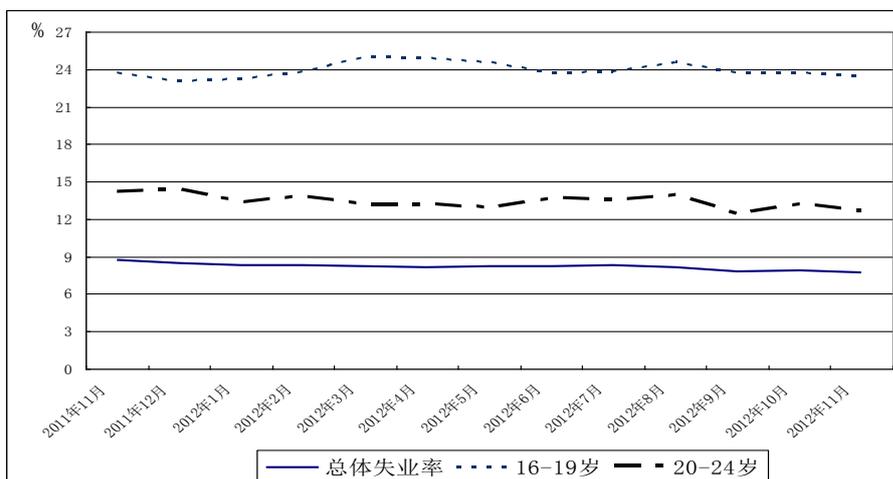
图 10 2012 年前 10 月美国失业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可以说，美国就业市场仍然非常脆弱，受各种政策影响较大。另外，有不少专家认为，目前美国的失业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也要注意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口数量同时也在降低，因此失业问题也许并没有得到缓解。更为重要的是，20岁至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接近14%（见图11），因此年轻人的失业状况令人担忧。

图 11 美国不同年龄阶段的失业率对比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从历史上看，当前美国失业率仍在8%左右的高位徘徊，距离金融危机前的6%以下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见图12）。12月12日，美联储决定，在失业率高于6.5%、未来一至两年通胀水平预计高出2%不超过0.5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将继续把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0至0.25%的超低区间。这是美联储首次公开将明确的失业率（6.5%）作为其货币政策调整的目标之一。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美国缓解失业问题尚需时日。

图 12 美国失业率的长期变化趋势 (2002-2012 年)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网站

政策展望

美国经济不仅复苏缓慢，而且增长也比较脆弱。虽然美国经济正在恢复内生增长能力，对外需和财政支出的依赖明显降低，但其当前的复苏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政府的各种政策。

虽然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明显减少，但它在 2012 年多次采取了重大的宏观政策刺激措施，特别是较多地使用了货币政策工具。2012 年 9 月 13 日，美联储宣布将从 9 月开始每月购买 400 亿美元机构抵押贷款担保债券，并视情况决定额外的采购额度。12 月 12 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又宣布，将在年底“扭转操作”到期后，扩大现有资产购买计划，并用量化数据指标来明确超低利率的期限。

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言，当前的美国经济恰似在以“失速速度”飞行，不费多大力气就能让它“坠机”。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 (Richard Freeman) 也表示，当前的统计数据显示的是“脆弱复苏”，美国经济仍然存在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其前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大选结果和美国国会是否能够避免“财政悬崖”。他表示，“考虑到世界经济形势，我们做的比其它很多国家都要好。……政府采取什么政策仍然很关键。”

“财政悬崖”将引发一系列的政策变化。根据目前的法律，到 2012 年年底，前总统小布什通过的所有减税措施都将到期，社保工资税率临时降低 2 个百分点的政策也将到期，未来 10 年将不加区分地削减支出 1.2 万亿美元。综合来看，写入当前法律的财政紧缩大约将占 GDP 的 4%。显然，如果“财政悬崖”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将直接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美联储预计，2013 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率为 2.5% 到 3%。费城联储的最新调查显示，私人预测机构预测 2013 年美国的经济增速为 2.1%。尽管当前有很多因素给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了压力，包括欧元区困境、新兴市场经济放缓等，但目前来看最大的问题是“财政悬崖”。具体而言，这同时涉及到劳方和资方两个方面。首先，美国国会必须考虑是否延长将于 2012 年年底到期的临时工资税减免和临时失业保障政策。奥巴马曾在 2012 年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最直接的当务之急是，在经济复苏仍然脆弱的情况下，避免给 1 亿 6 千万美国工薪阶层加税。”其次，坠入“财政悬崖”意味着布什政府出台的股息税税率 15% 的政策(金融危机后得到延期)将失效。股息税将再次恢复到近 40% 的税率。许多美国公司坐拥巨额现金，但鉴于围绕着“财政悬崖”和全球经济增长状况的不确定性，美国公司并不愿意进行投资。数据公司 Markit 的资料显示，自从进入 2012 年第四季度以来，美国已有 103 家公司宣布将在年底前派发特别股息，这个数字创下了历史纪录。该公司预测，宣布派发特别股息的公司最

终将达到 123 家，而往年的平均数值为 31 家。

所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近发出警告称，“财政悬崖”已开始拖累美国经济。他说，“在如何解决‘财政悬崖’、提高债务上限和长期预算状况等问题上的不确定性，看来已经开始影响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决策。”伯南克警告称，如果解决方案直到最后关头才出台，也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他表示，“我们的政治体系能否尽快拿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能否把不确定性控制在最低程度，将影响到市场参与者和公众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当前，白宫和国会继续就“财政悬崖”问题展开磋商。虽然华盛顿的政治分化导致目前的谈判几乎没有进展，但是可以预期能够达成某种妥协，从而消除这种政策不确定性的阴影。毕竟，任由美国经济坠入“财政悬崖”不仅会对复苏中的脆弱的美国经济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也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不利后果。■

“大选后的美国亚太战略走势 及中美安全关系”学术研讨会

2012年1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在京主办了题为“大选后的美国亚太战略走势及中美安全关系”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外交学院、国防大学、中国战略学会和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应邀参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主持了会议。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美国大选和我国召开“十八大”之后,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将面对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对美国而言,“再平衡”是长期性的战略调整。目前存在三个有利于美国推进其再平衡战略的因素:其一,由于奥巴马成功连任下届美国总统,未来4年不再面临选举政治的压力,他有可能放手一搏,孤注一掷地推进亚太战略;其二,美国国内各政治力量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基本达成共识;其三,亚太各国存在借助美国“平衡”中国的需要。

有专家指出,从国际视角看,美国在亚太地区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即美国可以在亚洲谋求经济利益,这对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极为重要;挑战即如果无法在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中心的亚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美国便无法维系其全球领导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下,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不仅会延续“亚太再平衡”战略,而且会进一步强化之。这种强化不仅是在程度上的,而且是在议题扩展意义上的。这具体体现为:第一,推动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强调新老结合和两洋对接。第二,重塑美国在亚太的经济主导地位,大力推动 TPP,增加对该地区的经济控制。第三,更多地介入地区争端,凸显其在该地区扮演的协调者与调停人的重要角色。第四,提高美国亚太军事部署的质量和效益,重点发展反介入的军事演习,特别针对第二、第三岛链以及南太平洋、印度洋。美国重返亚太显然是在变相地遏制中国,其核心目标就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当然,这与冷战时代遏制苏联不同,美国在遏制中国的同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与中国接触和合作的需求。

有学者认为,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同时面临三个长期性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三个矛盾:第一,目标扩大与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即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扩张与美国

国内经济复苏缓慢、奥巴马国内执政能力受到牵制之间的矛盾。第二，“东进”与“西顾”之间的矛盾，即中东地区仍旧是美国必须关注的地区，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叙利亚等国势必会持续牵扯美国的外交与战略能力。第三，对中国遏制与借重之间的矛盾，即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势必引发中美竞争，但在更为广大的全球事务范畴中，美国又需要中国的合作。奥巴马政府在内政难以实现突破的情况下，只能在国际问题上谋求更多的政治遗产，而这就需要中美之间加强合作。

针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新走势，与会者提出了一些对策性建议：第一，中国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区别对待，软硬兼施，同时加强军事、科技、经济方面的实力。在对美国保持强硬姿态的同时，面对东亚周边国家所形成的中国战略困境，中国首先要做到不惧怕，要处理好内外关系，不必一味强调内部稳定，对外也应适时强硬起来。第二，在安全与战略上做到积极接触与积极应对同步。要沉住气，做好走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的准备，强化多领域多层次的中美战略协调机制，寻找避免进入战略困境的途径，同时加强军事斗争的实力，增加对美国的威慑能力。第三，继续推进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本着“十八大”报告精神中对于周边国际形势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判断，中国不应该也不会与美国叫板或摊牌，所以关键还在于如何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与会者一致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的中美关系可以理解为在国家战略安全层面的大国博弈。首先，中美大国关系不完全是零和博弈，因为世界已经发生从“敌我界限分明”到“无法界定对手”的重大变化。其二，中国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的意识是坚定的，还没有意愿或强大的能力挑战美国。其三，中美之间的战略能力尚可维持某种程度上的平衡，中国会维持某种程度的力量对应诸多不确定性。其四，未来国际关系发展中，像九一一事件这样对美国形成重大战略牵扯的重大转折点很难再出现，但小幅度的转折点仍有可能出现，中国应该对其充分加以利用。

（刁大明 供稿）

“中美公共外交：经验与挑战”

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11月22日，“中美公共外交：经验与挑战”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综合国力变

化与国际比较”创新项目组承办，来自外交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等单位的近 30 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下述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关于“公共外交”的界定

与会者首先就如何界定“公共外交”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陶文钊研究员认为，公共外交有别于公民外交（Citizen Diplomacy）。公民外交是社会行为，但可能会配合政府的外交；公共外交是政府行为，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政策，其主要作用是塑造国家形象、扩散软实力和加强沟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张平先生指出，美国对“公共外交”的定义比较窄，包括“传播”和“交流”两部分，强调以政府为主体，传播美国的价值观，解释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注重对外交流。中国对“公共外交”的定义比较宽泛，参与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和民间组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韩召颖教授强调指出，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外国公众，作为辅助性手段，其作用是长效的、间接的，起关键性或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国家的外交、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

美国公共外交的性质、特点与效果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且取得显著成效的国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指出，美国的公共外交是以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如果国内问题重重，其公共外交也难以达到好的效果。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公共外交，经常是朝野同心一起开展活动，政府在社会力量的背后扮演着推手的角色。另外，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大公司为实现其某些利益或使命，也乐于开展公共外交。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赵可金副教授指出，美国的公共外交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执行工具，讲求硬功夫而非软实力，具有胁迫性，善于将公共外交植入美国智库、大学、公司、宗教组织的各项活动中。

与会者探讨了当前美国公共外交面临的问题。陶文钊研究员认为，一个国家的公共外交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其外交政策是否正确；错误的外交政策会限制公共外交的作用。他以奥巴马总统在开罗大学的演讲为例：尽管奥巴马在演讲中表达了美国试图与穆斯林世界改善关系的愿望，但由于美国的中东政策有误，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态度并未因此而发生积极的转变。赵可金副教授认为以下因素影响了美国

公共外交的效果：第一，公共外交和外交由不同人群分管，彼此间存在竞争和冲突。第二，美国人有传教士的心态，总想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第三，美国人内心潜藏着种族主义。第四，1998年美国新闻署并入国务院之后，其公共外交进入“管办合一”时期。

中国公共外交的新气象

与会者畅谈了中国公共外交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外交部新闻司鲁世巍参赞表示，中央高度重视公共外交，“十八大”报告更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他指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为我国公共外交的开展提供了多种手段和资源，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开展公共外交的意识也普遍提高。他介绍了外交部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为领导人开展公共外交提供服务和设计；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与学者进行交流；在国内外进行舆论引导；以“外交小灵通”等形式开展网络公共外交；重视机制建设，加强部内、部际合作与协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薇薇指出，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在2012年有所改善，外国媒体和学者对中国的报道和研究变得更加理性，口吻更加平和，这是中国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宣传和解释自己的结果。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国处处长段军介绍了对外友协在开展民间友好工作、为中国外交服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对其工作特点进行了总结，包括：第一，以情动人，注重感情的培育与积累。第二，以理服人，通过深入交往展现中国人的通情达理，有理有据地巧妙应对来自外方的不友好的攻击。第三，用事实说话，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国家汉办规划处处长樊钉介绍了孔子学院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孔子学院仅用8年时间就完成了在许多国家布点的工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孔子学院采取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模式，从语言教学入手，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重点开展民间交往工作。南开大学的韩召颖教授认为，通过开展广泛的活动，孔子学院为打造中国外交的基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的傅由教授也肯定了孔子学院在对外汉语教学和对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问题与机遇

关于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金灿荣教授指出，中国开展公共

外交主要面临以下困难：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对其他国家的民众吸引力不够大，国内百姓也尚未做好承担国际责任的准备。第二，中国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基因不同，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不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理解。第三，与政府相比，中国的社会力量相对比较薄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吴白乙研究员认为，人类进步推动了精英政治向草根政治的转变，导致中国外交越来越受到国内舆论的压力和影响。信息化改变了外交决策的环境，“一对一”式讨论或交涉的力度和效果已不比从前，因此，应更多地关注国内公共关系。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利用公共外交新载体方面比较落后，没有将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汇集成有效的公共交流的语言，中美在公共外交方面的竞争明显不对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莉丽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整体上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部门间协调、公共外交战略、媒介等方面均存在问题，学术界和理论界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也比较薄弱，不足以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提供思想支持。赵可金副教授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说得多，做得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口号式公共外交”。第二，过分依赖软资源——特别是传统文化，对当代资源开发的不够。第三，过于重视上层和精英路线。第四，存在“灯下黑”现象，国内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妨碍了我国公共外交的成效。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但与与会者普遍认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也有其优势。鲁世巍参赞指出，尽管目前公共外交的基本格局是“西强我弱”，但展望未来，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金灿荣教授指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有两大优势：第一，中国的工业化本身有其独特之处，如能认真加以总结，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底子深厚，思想资源“矿产”丰富，应以平常心恰当地展示文化自信。他认为学者有责任在上述两方面挖掘公共外交的资源，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赢得话语权。

中国应如何开展公共外交

对于中国应如何开展公共外交，与会者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张平先生指出，在外交上创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战略机遇期，需要从国家和政府层面上对中国的公共外交进行认真规划，打造立体的公共外交战略。在国家战略层面上，需要加强机制上的统筹协调，收缩战线，集中资源，确立重点，对中国对外传达的信息和展示的形象，要有理性和长远的考虑。

针对中美之间在公共外交方面存在的竞争不对称，吴白乙研究员提出，中国需要重视网络，打赢网络宣传战，同时选择“对象下沉”，面向外国普通民众，用他们

听得懂的语言和方式讲述中国的故事。同时，中国还需要在政策框架内推出主打的价值观，抗衡美国强调的普世价值观。王莉丽对“对象下沉”之说提出了不同见解。她认为对美开展公共外交，首先要明确美国公众舆论的构成要素，确立以美国智库为中心的精英舆论影响机制。在她看来，智库在美国精英舆论中处于舆论领袖的地位，对美国政府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中国观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决定性作用。她建议，开展对美公共外交可以把美国智库作为突破点，在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上通过影响美国智库来影响美国政府、公众、利益集团和公众舆论。

针对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所面临的国际话语权困境问题，张薇薇副研究员提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要充分注意中外文化差异，在中外交往中要敢于争辩和直接回应，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清华大学对外传播中心副主任周庆安对比了冷战以来美国与中国的公共外交，认为美国的公共外交是对冲型的，旨在抵消世界各地的反美主义；中国的公共外交是增量型的，旨在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对美国来说，世界对它的了解已经比较多，且了解越多反美情绪越强烈，因此它主要开展对冲型公共外交。而世界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主要源自对中国的不了解和不理解，因此中国需要开展增量型公共外交。但随着近 10 年国际战略格局、中国国际地位需求和国际舆论生态的变化，中国开展对冲型公共外交的需求也在增加。

本次研讨会议题广泛，讨论深入，既有观点的共鸣，也有思想的碰撞，有助于推动和深化有关中美公共外交的研究。

(仇朝兵 供稿)

“2012 年美国大选后的中美战略关系走向”

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 年 11 月 26 日，“2012 年美国大选后的中美战略关系走向”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事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等单位的 50 多位学者与会，就大选后美国对华战略基本态势、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以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等议题提出了

建设性的理论分析。

关于美国对华战略态势，多位学者指出，2012 大选后美国对华战略将基本保持竞合的态势，但竞争性因素正在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研究员指出，过去几年来的中美关系具有几个特点，包括：高层互访作用递减；第三方因素从积极转化为消极；军事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中国国内政治开始介入中美关系；在双方矛盾和摩擦增加的情况下，中美之间没有发生重大危机。多位学者认为，美国对华战略与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密切相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贺力平教授指出，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和过去大国间的战略关系相比，很重要的差别之一是两国的经济关系十分密切，经济高度依存成为两国关系稳定的重要基础。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指出，中国已于 2011 年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三大商品出口市场，也是美国增加出口的最有力的市场。奥巴马政府落实出口倍增计划，振兴美国经济，离不开中国市场的支撑。同时，也有多位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存在变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副所长、荣誉学部委员陶文钊研究员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史无前例，美国的心态因此发生变化。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新节点上，可能发展，也可能逆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认为，中美中长期关系的变数主要来自美国在财政经济困境中对中国的疑虑和中国对自己身份和利益的认知矛盾。

关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与会者普遍认为，由于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没有连任压力，其外交安全团队将会有较大的调整。奥巴马政府会在强化亚太军事存在、伊朗问题、叙利亚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以及朝鲜核问题等多方面寻求突破，直接形成对华政策变数。美国将对再平衡战略逐步展开调整，在全球军事收缩的状态下，进一步西收东移，在强调政治与安全问题的同时，补强重返战略中的经济配套措施，在关注东北亚的同时，更加重视东南亚，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增加对华的压力，同时可能对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进一步制造障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祖贵教授指出，美国对中东能源的依存度在下降，在中东的主导意愿也在下降，维护主导地位的手段和策略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多地寻求盟友和多边机制的支持，中美之间存在维护中东能源通道安全的共同利益和政策可能性。有学者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幅度受到其整体外交战略和具体政策环境的约束。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梦孜研究员认为，美国对华战略总体上服从于美国的整个外交战略，其核心目标是重振美国的战略地位。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有一定的承继性和共识基础，其对华战略不会因为人事变化出现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政治室主任周琪研究员指出，奥巴马连选后将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一系列艰难抉择，中东问题对美国而言比亚洲事务更为紧迫。美国在伊朗核问题、结束阿富汗

作战任务、叙利亚问题以及巴以和平问题上，都需要同中国合作。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与会者一致认为，中美关系并非必然是零和博弈，但是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双方共同付出努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楚树龙教授指出，由于中美两国在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共同利益之外，还需要双方尊重彼此的不同点，不挑战、不危害对方的重大利益，这样才有可能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研究员指出，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美两国需要超越大国竞争的传统思维，在超越当前意识形态分歧的更高的价值认同上寻找共识，从地区多边机制入手取得合作关系的突破。陶文钊研究员认为，两国需要在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无法建立互信的领域之外建立互信关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刘学成研究员指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美国对再平衡战略进行再调整，合理利用多种机制，面对现实管控分歧，以建设性方式处理问题。中美最高级领导人应尽快确定两国关系方向、大的方针战略以及政策框架，以利未来4年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中心主任姚云竹研究员指出，中美两军关系是中美两国总体关系中的短板，双方应该积极寻找利益共同点，特别是在反恐、打击海盗、救灾、护航、维和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展开互利合作，通过合作积累共信。双方应在有一致利益的全球公共安全领域展开互利合作，并在亚太地区寻求一个中美都能发挥作用的多边机制。

本次研讨会内容丰富，交流比较充分，得到与会学者积极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做了总结性发言，指出中美关系无法简单维持现状，更要防止落入零和式的冷战游戏，需要在全球、地区和重大领域共建一个健康积极的战略框架，营造建设性的进程，逐步走出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真正建立起新型的大国关系。

(王欢 供稿)

“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对外政策的调整：

回顾与评估”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11月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战略室与“美国对华战略发展趋势”创新项目组共同举办的“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对外政策的调整：回顾与评估”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邀请了来自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所、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和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专家和学者，对奥巴马政府首届任期内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回顾与评估。现将与会者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有学者指出，奥巴马政府面临上届政府留下的烂摊子和严重的金融危机，将外交政策目标确定为保障国内的经济建设。为此，它采取了灵巧的外交手段，以求以尽可能少的资源维持美国的霸权目标。其在外交领域的主要业绩包括：美军从伊拉克撤军；以更小的成本和更少的资源“反恐”，成功“止血”；改善了美国在欧洲和中国以外的亚洲地区的形象；推动了“重返亚洲”的战略转变；力推全球气候变化和无核世界两大“道义”目标。今后奥巴马政府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在推行“重返亚洲”战略的同时平衡美国与亚太盟友和中国的关系；无法从中东有效抽身和不得不增加对中东的关注。从长远来看，美国的战略重点是亚太地区，但中东的问题更为紧迫。

针对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或称“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学者指出，2009年末以来的一系列争端导致中美两国发生战略冲撞，美国的亚太战略也呈现出针对中国的态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在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两国关系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一个刺激、反应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目标更多地旨在搭上亚洲经济发展的快车。美国也在调整其“重返亚洲”战略的意图和框架，以增加与中国之间的战略信任。美方认为，这一战略太过关注军事和安全问题，忽略了经济和文化因素，因此需要再平衡。美方突出军事和安全因素是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其实际的军力部署只是微调，更具有象征意义，但确实含有牵制中国的意图。

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周边和亚太地区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未必站在美国一边，中国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应重视发展与邻国间的关系，为其提供安全保障，重新定位中美关系在我国对外关系中的位置。同时，我国应保持与美国合作的基调，避免冲突发生，这对我国今后20年的战略机遇期非常重要。

关于美国的经贸政策，有学者认为它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大。在全球治理层面，奥巴马政府注重G-20框架；在国内层面，奥巴马政府短期内出台了经济刺激措施，同时推出了以新能源产业为核心来重振制造业的长期策略，并实施出口倍增计划，以重振美国经济。至于美国一直在推动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由于美国自身存在长期经济失衡的问题，即美国高消费的生活模式及美元的主导地位难以动摇，短期内这一平衡还难以达到。在贸易方面，有学者指出，奥巴马政府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由于标准太高，对参与的国家冲击很大。由于地理上较为广阔，TPP成员国之间的远距离也会使其效果大打折扣。TPP对于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还难

以断定，其核心问题是站队的问题，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安全和政治综合体。

谈及中美经济关系，有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所受的关注正在减少，相比之下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更受关注。美国也加强了对中国对美投资的关注和审查。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依赖很深，美国需要中国市场以促进出口，需要中国投资以创造就业。在两国贸易问题上，美国存在一种针对中国的全方位指责，包括要求中国像美国一样为导致经济危机的全球经济失衡负责，认为人民币被低估和较低的环境成本、劳工成本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之一。美国对其对华贸易保护政策的辩护以及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的指责，都将矛头从具体的行业转向中国的体制和制度。

在气候变化政策方面，有学者指出，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极为重视发展清洁能源和改善能源安全，试图寻找经济的新增长点，但 2010 年国会中期选举失利后，气候变化政策再难推进。奥巴马政府全方位推动了与中国的气候合作，但双方的根本分歧并没有缩小，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更暴露了两国间的根本分歧。此外，由于清洁能源市场缩小及中国的竞争，美国许多清洁能源企业宣告破产，要求对中国清洁能源企业展开调查，两国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问题。然而，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的基调并没有改变。对于中国来讲，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攻守易位是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

(何兴强 供稿)

美国战略要闻

(2012年10-12月)

- 10月3日 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驶抵台湾东部海域。此前，“约翰·斯滕尼斯”号航母继9月26日在钓鱼岛海域航行之后，穿过南海抵达马来西亚附近海域活动。日本政府认为，美国在该地区同时出动两个航母战斗群意在表明其立场和彰显日美同盟的意义，含有牵制中国的意图。
- 美国国防部透露将在日本嘉手纳基地部署F35隐形战机。
- 10月7日 韩国宣布已与美国达成协议，将韩国导弹的最大射程由现在的300公里增加到800公里。这意味着朝鲜、中国、日本、俄罗斯都将落入韩国导弹的射程范围内。尽管美国白宫发言人卡尼强调该协议旨在应对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但外界普遍担心美韩此举会引发军备竞赛。
- 10月8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称，中国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为中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干预美国通信网络的机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报告建议阻止这两家企业在美开展投资贸易活动，并建议相关美国公司避免同华为和中兴合作，以免造成知识产权方面的损失。该报告并未出示任何明确的证据。
- 10月8-18日 美国和菲律宾在巴拉望省海域和相邻几个省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菲律宾海军和空军人员首次参加该演习。演习项目包括直升机突袭、实弹射击、抢滩、灾害应对和人道主义援助。据菲律宾官员称，该演习是第29次举行，旨在提高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的两栖作战能力，因为菲律宾军队的关注点已从国内安全威胁转移到领土防御。
- 10月10日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涉及中国人权的年度报告。报告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批评中国“违背贸易规则”，并对中国工人的现状妄加评论。报告建议美国国会和总统敦促中国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强法制，

增进“政治透明度”，“无条件与少数民族对话”，释放被关押的持异见者。

10月11日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点名批评中国和俄罗斯，称来自这两个国家的网络威胁“可能给美国造成与九一一事件同等程度的破坏”。

10月12日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官、海军上将洛克利尔首次访问印度期间，提出美国和印度应当建立密切的防务合作关系，确保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地区的长期安全稳定。洛克利尔表达了美国乐于同印度在反恐和救灾领域深化合作的意向。尽管他强调与中国的交往和合作十分重要，但声称“美国如何能允许中国成为国际安全环境的成员国？……中国必将是印美共同的目标。”

10月14-15日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访问日本，与日方讨论美日在东亚及全球问题上的协作。他表示，美国不希望日本让中日钓鱼岛争端升级，希望中日双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9月25日，美国国会研究局曾发布题为《钓鱼岛争议：美国条约的义务》的报告，称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只承认日本的“行政权”，而非“主权”。美国国务卿克林顿不久前也在联合国大会及美日韩外长会议上要求日本在钓鱼岛争议上采取慎重及有效的行动，以和平方式缓和中日关系。伯恩斯此次访日重申了美方的上述立场。

10月15日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公布的研究报告称，亚洲主要国家及地区过去10年的国防开支迅猛增涨，其中中国、印度、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整体军事开支翻了一番，中国的总军费开支目前仅次于美国。报告指责中国军费的猛增“刺激”了亚洲地区的军费增长。

10月16日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塞西尔·黑尼在于东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日中两国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钓鱼岛争端，美国在此问题上不选边站队。针对中国军舰近日在冲绳附近海域航行一事，黑尼表示“中国和美国一样，有在公海上航行的权力”。

10月16-17日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访问中国，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副部长张志军会谈。中方重申了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严正立场。伯恩斯表示，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与中方一道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 10月20日 由美国前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启程前往日本和中国进行访问，希望调解因日本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引发的中日关系紧张。此次访问得到了美国国务卿克林顿的支持。访问团成员包括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前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斯坦伯格、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据访问团成员称，美国不会向两国提供具体提案，但准备就缓和局势协商各种方法。22日，访问团一行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举行会谈。23日，访问团受到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接见。李克强重申了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强调国际社会应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由于美国实际上是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制造者之一，且奥巴马政府在此问题上一直立场暧昧，访问团此行的成效令人质疑。
- 10月24日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刊登《战略重心之外的规划》一文称，在美军“联合作战介入方案”(简称JOAC)的框架下，美国空军与海军拿出了“空海战”计划，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则推出“夺取并维持通路方案”(简称GMAC)。同时，海军陆战队与海军的“单一海战”计划同样涉及“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简称A2/AD)作战，并属于“联合作战介入方案”框架下的构想。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各大军兵种竞相谋划反制区域拒止/反介入，既是美国军事战略的需要，也是四大军兵种为争夺军费“蛋糕”份额而为之。
- 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经过包括黄岩岛在内的南海争议地区抵达菲律宾，对菲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尽管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此前声称“乔治·华盛顿”号此行旨在提高美菲两国强劲的历史关系，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美国抗衡中国影响力的最新军力展示。
- 10月29日 美国、印度、日本第三次对话在新德里举行，议题包括海上安全合作、阿富汗问题、中亚事务等。对话三方认为，三国在西起波斯湾、经由印度洋与马六甲海峡直至中国南海的国际航道上拥有共同利益。印度媒体评论称，美印日三边对话机制符合印度增加区域内影响力的战略需求。
- 11月1日 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于华盛顿举办的研讨会上称，未来数十年内中美关系将面临更多挑战，“必须认识到，只有当中国政

策嵌入亚洲战略之时，它才能发挥到最好。”他认为良好的中国政策不仅要适用于中国，而且应当确保其他国家与美国能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展开对话。

11月5-16日 美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日本附近海域举行名为“锐剑”的联合军演。演习的主要内容是假想日本与亚洲地区某国发生军事冲突，美日两国进行“协同作战”。迫于中日关系紧张的情势，日美双方拒绝对外公开演习内容，但11月26日美军公开了演习照片，显示此次军演共出动26艘军舰，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引领下进行编队航行。日本新闻网认为，美军公开军演照片意在牵制中国。

11月6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当日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连任总统成定局。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网站发表文章称，美中两国爆发军事冲突对双方而言都是灾难性的，只要美国保持足以威慑可能导致的冲突的能力，两国间的军事摩擦便不太可能产生。文章认为，向中国的邻国提供防务支持将会提升美国的防御和威慑能力。

11月9日 日本防卫省副大臣长岛昭久与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卡特、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分别举行会谈。应日方要求，双方就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达成一致，以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备和海上军事活动。双方还就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共用基地、日美联合军演方式等议题进行了磋商。

11月10日 据人民网旧金山电讯，皮尤调查中心最近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66%的受访美国人视中国为竞争者，只有1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合作者。美国民众最担心中国在经济上挑战美国，对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严重、大量工作机会流向中国表示担忧，希望美国政府在经贸关系方面对华采取强硬态度。

11月14日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称“中国已成为网络世界最具威胁性的国家”，中国的情报机构和黑客利用愈加复杂的技术进入美国军方和国防承包商的计算机系统，正在威胁美国军队的备战和作战能力。报告建议美国政府深入评估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同时“加强对中国国有企业投资的监控”，对从中渔利的中国企业加大处罚力度。

美澳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会议在澳大利亚召开。双方商定，美

军将在澳大利亚安置功能强大的空军 C 波段雷达和太空望远镜,以便美军更好地追踪空间碎片和中国的空间发射。双方还就美国扩大使用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基地事宜进行了讨论。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同日宣布,驻澳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规模将逐渐加大,于 2016 年达到一个完整海军陆战队旅的规模。尽管美澳双方称此次对话和两国关系的加强没有遏制中国的意图,但美国在亚洲应对中国崛起的步伐显然正在加快。

11 月 15 日

奥巴马总统致电胡锦涛主席,表示他珍视与胡锦涛主席一道为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和促进两国人民友谊所做的共同努力,未来几年将继续致力于发展中美关系,建设有利于两国人民福祉、促进地区与全球和平、繁荣的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表示奥巴马连任后首访亚洲标志着美国向亚太“再平衡”的政策开始进入新阶段,显示亚太地区继续成为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内的“战略优先”。他强调,美国的“再平衡”政策不仅是向亚太地区的再平衡,也是在亚太地区内部的“再平衡”,即重新关注东南亚地区和东盟机构。他阐述了“再平衡”政策的五大重点,包括“升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盟友关系、深化与印度和印尼等新兴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参与并支持东盟以及东亚峰会等区域性组织、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和建设性关系以及推动区域性经济架构的发展,强调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涉及美国国力的每一个方面,是一个长期努力方向,将使美国“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面对我们在这个世纪可能遇到的机会和挑战”。关于中美关系他表示,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将继续成为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施政重点,美国将努力平衡与中国的合作和竞争,寻求以健康而非破坏性的方式处理好双方的分歧,鼓励中国更多地以全球共同关切来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帮助国际社会解决全球性问题承担更多的责任。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访问澳大利亚城市阿德莱德期间,针对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 14 日指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以牺牲重要的亚洲邻国关系为代价,死抱美国同盟,从而损害了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影响力”的言论,警告澳大利亚不要在牢固的澳美关系和新兴的澳中关系上做出“错误的选择”,“这种零和思维

只能导致负和结果”。她表示，美国支持澳大利亚与亚太地区各国发展强健的、多方面的关系，但是美澳同盟植根于两国共同的历史和奋斗目标，对两国的好处显而易见。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和泰国国防部长在泰国签署《2012年泰美防务联盟共同愿景声明》。帕内塔称，这份声明致力于全面规划和提升美泰军事合作。

据美国《国防》月刊报道，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海军陆战队中将托马斯·科南特在国防工业协会年度远征作战会议上称，美军把关注重点转向太平洋不是挑衅中国，而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该地区实力较弱的国家可能会把中国的经济扩张视作对它们主权的威胁。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忧虑，是该地区的焦虑情绪可能会扰乱马六甲海峡等咽喉要道的全球贸易运输。通过与该地区的小国建立伙伴关系，美军或许能阻止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

11月16日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柬埔寨与东盟国家防长会晤时表示，美国将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在该地区参与更多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他承诺，美国对亚洲的战略再平衡是真实而持久的。

11月18-20日 奥巴马总统访问泰国、缅甸和柬埔寨。18日，奥巴马与泰国总理英拉会谈后表示，美国将巩固两国的传统同盟关系，为此首先要加强美泰军事同盟；美国还将积极推动两国的贸易与投资合作。英拉表示，泰国会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并已开启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的进程。19日，奥巴马总统作为50年来首位访问缅甸的美国总统抵达仰光，会晤缅甸总统吴登盛和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表示希望缅甸继续推进政治和经济改革。据美方高级官员称，美国将对缅甸提供1.7亿美元的援助，并邀请缅甸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由美、泰两国举办的东南亚地区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20日，奥巴马作为首位访问柬埔寨的美国总统与柬埔寨首相洪森会晤，表示柬埔寨的人权记录将会阻碍其与美国深化关系，要求柬埔寨推进自由公平的选举。洪森对奥巴马的批评予以反驳。奥巴马赢得连任后旋即出访与中国交好且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亚三国，显示其将在第二任期内继续坚定地推进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特别是加

- 强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与中国在亚洲展开竞争。
- 11月20日 第七届东亚峰会在金边闭幕。除东盟十国外，美国、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国首脑或高官也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金边发展宣言》，宣布将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建立一个GDP超过欧盟的共同市场。会议主旨是经济合作和地区一体化发展，但美国将“海上安全”纳入会议议程及部分东盟国家在此问题上指责中国的做法，破坏了东盟的团结。奥巴马总统告诫亚洲国家在南海争议中应保持冷静克制，敦促中国和其海洋邻国不要因岛屿的主权诉求而增加“损害正常贸易关系”的风险。在与温家宝总理的会晤中，他表示中美在保持世界经济增长方面负有“特殊责任”。在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的会谈中，奥巴马强调美日同盟是地区繁荣和安全保障的基础，希望日方能够慎重对待中日领土问题。在美国的召集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扩大谈判部分参加国的首脑当日在金边举行了紧急会议，商议加速谈判进程的具体事宜。
-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离开东亚峰会，前往中东地区调停加沙地带不断升级的巴以冲突，以避免因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进攻导致该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并进而牵制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题为《美印军事交流》的报告，指出印度的官僚政治阻碍了美印间的军事交流，印度军方能力不足，印度政府不愿在亚太地区扮演更为显著的安全角色。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制定长期规划，采取就阿富汗和中国军力问题与印度对话、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多方合作、与印度分享印度洋基地等举措，将两国军事关系捆绑在一起。
- 11月26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就中国航母发展、南海问题和中国新版护照表示，中国应提高军费开支透明度；中国新版护照地图印章属于技术性问题，不影响护照持有者入境美国。她称美国将继续推动中国就争端海域与邻国对话，并适时给予亚太盟国适当的安全支持。
- 11月26-29日 美国海军部长雷·马伯斯应邀访华，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和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中方在会面中强调中国军力建设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马伯斯表示，作为两个重要的太平洋国家，两国海军间的交流与合作是两军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之一。

- 11月27日 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认为，中国作为主要贸易对象并未操纵货币汇率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但人民币价位“遭到严重低估”。
据美国《星条旗报》报道，美国空军和地方安全公司正在联手打造一个虚拟的“网络城市”，以供美国的黑客战士演练防止入侵和保卫国家的能力，同时验证进攻性的网站战法。
- 11月28日 据法国“宇航防务”网站披露，美国洛马公司宣布成功进行陆基激光反火箭系统测试。该武器依靠电力产生致命的杀伤效果，将为地面部队提供防御近程空中目标威胁的能力。
- 11月29日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表示，美国政府将军事、外交及商业重心转移至亚洲并非意在威胁中国，而是旨在加强亚太秩序，保证该地区在未来数十年内的和平和繁荣。她指出，中国未来的道路将取决于它如何掌控新的经济挑战、与邻国的分歧及其政治和经济体制所承受的压力。
- 11月30日 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负责人致信奥巴马政府高官，指责中国继续背离市场化改革，经济日益被国企控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提供补贴，奉行经济保护主义。
- 12月1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发表书面声明称，朝鲜再次发射卫星属于“极具挑衅性的行为”，将会危及本地区和平与安全。朝鲜方面任何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卫星之举都会直接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1718号和第1874号决议。她表示，如果安理会采取相应行动，美国将会积极予以配合。
- 12月3日 针对西方情报显示叙利亚军方有使用化学武器的动向，奥巴马总统警告称，如果叙利亚政府动用化学武器，它将会为此付出代价。这是两天之内美国第三次警告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是美国军事打击的“红线”。叙利亚外交部否认了美欧的指责，强调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本国人民使用化学武器。
- 12月4日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修正案。该修正案称，美国对钓鱼岛最终主权不持立场，但承认日方对该岛屿的行政管辖权，任何第三方的单方面行动均不会影响美国的上述立场。修正案宣称钓鱼岛是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同时强调反对试图通过“武力威慑和动武”来解决领土主权问题的举动。

- 12月5日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举行多名中美商务人士参加的大使投资论坛，表示今后将重点推进和落实美中之间的投资事宜，促进中美经贸往来。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认为，在改善与推进美中关系方面，骆家辉带头敲响了“务实合作”的大门。他表示，美国欢迎中国企业赴美发展，个别企业遇挫的案例不代表美中商贸合作的主流和方向。
- 12月7日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宣布，中国、印度、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南非、斯里兰卡、土耳其和台湾地区因进一步削减从伊朗进口的原油量，被列入伊朗石油制裁豁免名单，豁免期限为180天。这是2012年美国第二次将中国列入这份向国会建议的豁免名单。
-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称，美国情报部门即将完成的首份境外针对美国目标的网络间谍攻击状况评估报告将估算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给美国带来的经济损失，并判断中国政府在指挥和协调盗取美国知识产权的网络攻击中所扮演的角色。
- 12月10日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题为《全球趋势 2030：可能的世界》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将成为未来世界中“一个关键的主题”，预测中国经济会在2030年之前超过美国，亚洲的实力将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在安全领域，民族主义的蔓延将导致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中美之间的对立有可能激化。报告的主笔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面对全球性挑战，中美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大于对抗性的可能性。
- 12月11日 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承认“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为叙利亚人民的代表。这意味着叙利亚反对派的“合法性”被进一步扩大，标志着美国孤立巴沙尔政权的努力进入新的阶段。同日，美国将有“基地”背景的“胜利阵线”列入全球恐怖组织名单，以削弱极端分子在叙利亚的影响，
- 12月11-12日 美、菲两国官员在马尼拉举行第三次双边战略对话。对话重点讨论加强两国的安全和经济关系，增强美国军事力量在菲律宾的“流转存在”，即美国军队和舰艇经过菲律宾或在菲演习或对菲军进行培训，由此避开菲律宾宪法禁止外国在本国设立永久基地的规定。
- 12月12日 美联储推出新一轮债券购买计划以刺激经济，同时宣布将超低利率政策与失业率和通胀水平挂钩。该举措被视为美国的第四

轮量化宽松政策 (QE4), 它将进一步扩大美元的流动性, 造成全球流动资金过剩。

12月13日 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 谴责朝鲜发射卫星的行为, 表示将“适当回应”。美国寻求加大对朝制裁力度, 中国没有明确表态。据《纽约时报》称, 美国警告中国, 如果不能约束朝鲜, 将导致美国在太平洋更大规模的军事存在。有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战略的本质就是迫使中国做出“不舒服的选择”。

12月14日 奥巴马总统签署反俄法案《马格尼茨基名单》。这意味着被指控违反人权的俄罗斯官员将无法获得美国签证, 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也会被冻结。作为报复, 俄罗斯国家杜马于12月21日通过了禁止美国人收养孤儿的《季马·雅科夫列夫》法案。美俄关系面临新的考验。

12月17日 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 美国军方实验室正在提高数字破译能力, 试图通过无线电系统渗透进入看似安全的网络, 寻找途径向系统注入木马病毒。

12月18日 奥巴马总统与即将出任首相的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通电话。双方重新确认了“日美同盟作为东北亚地区和平和安全基石的重要性”, 讨论了加强双边安全合作、深化经济关系等问题。在国防开支紧缩的情况下, 美国既希望日本新政府担负更多的安全职责, 又担心安倍晋三在对华钓鱼岛争端中态度过于强硬, 使日本自身的利益受损, 同时令日美关系更加复杂。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 详细阐述了未来美军的发展方向。他表示, 未来美军的规模将会更小, 但美军仍将活跃于全球。预算僵局和议员们的消费选项是美军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威胁。为了未来能同时打两场战争, 五角大楼需要在航母舰队、两栖舰队、远程打击能力等方面进行投资。他强调, 亚太地区是美军未来部署的重中之重。

12月18-19日 第23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在华盛顿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柯克、美国商务部代部长布兰克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共同主持了会议。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技术转移、消除扭曲贸易的产业政策和阻碍美国出口的障碍。

12月20日 据法新社报道, 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称, 五角大楼准备同缅甸建立最初步的军事关系, 即美国为缅甸军人提供人道援助、军事技术和国防改革方面的培训, 以推动缅甸的改革进程。

- 有学者指出，美国这一举动将影响缅甸的局势，并进一步牵制中国走向印度洋的步伐。
- 12月21日 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参众两院协调版本的《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根据该法案，2013财年美国的军费预算总计约6330亿美元，其中5280亿美元用于采购武器、更新装备、支付工资等日常支出，880亿美元用于阿富汗战争，170亿美元用于核武项目。此外，法案批准投入近4.8亿美元用于美以反导系统，其中2.11亿美元将用于以色列拦截短程弹道导弹的“铁穹”系统。该法案要求加大对伊朗能源、船运及广电机构的制裁力度，严禁外界向伊朗提供贵金属；针对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遇袭身亡事件，要求增派1千名海军陆战队员保护美国驻外使领馆的安全；要求五角大楼就美军出兵叙利亚的可能方案提交报告。法案包含两项表达两院共识的“意向性”条款，分别涉及钓鱼岛和对台军售。涉及钓鱼岛的条款称，美国对钓鱼岛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但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强调钓鱼岛是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涉及对台军售的条款则要求美国向台湾出售F-16C/D或类似机型的战斗机，以确保台湾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尽管上述条款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已对中国的主权和内政构成粗暴干涉。
- 12月22日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公布长篇报告，再次指责中国政府“向伊朗出口导弹和其他武器”，臆断中国希望用武器贸易换取伊朗的能源，并借助伊朗核计划的推进抵消美国的影响力。
- 12月31日 美国白宫与参议院共和党达成“财政悬崖”解决方案。根据该方案，美国将在2013年向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上的富裕家庭增税，并延后两月执行将在2013年年初启动的约1100亿美元政府开支削减计划。该方案还需国会参众两院投票通过并经奥巴马总统签字后方可生效。

(罗伟清 整理)

学术活动与交流

- 10月5-6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与海南大学在海口召开“亚洲的地缘政治局势及其中的美国因素”研讨会。黄平所长主持会议。
- 10月9日 倪峰副所长参加俄罗斯智库代表团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座谈会，并就“美国大选形势和中美关系”作了发言。
- 10月9-11日 王孜弘研究员、王荣军研究员、韦伟副研究员、刘元玲助理研究员赴澳门出席第六届中美经贸关系国际研讨会。
- 10月10日 美国国会代表团一行四人来访美国所，就朝鲜半岛问题与科研人员进行交流。黄平所长主持座谈会。
倪峰副所长参加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中美人文外交与战略互信”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当前的中美关系与战略互信”的发言。
- 10月14-19日 倪峰副所长、王荣军研究员赴美国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胡佛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双边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中美对话：加强亚太地区合作与战略互信”。
- 10月15-18日 黄平所长赴俄罗斯参加“21世纪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研讨会，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与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在海参威召开的“东亚地区安全会议”。
- 10月23-27日 黄平所长应邀参加美国亚洲太平洋安全研究中心举行的“美国战略调整：亚洲-太平洋的视角”专题研讨会，并发表题为“中国和平发展与周边安全环境”的演讲。
- 10月29日 美国进步中心代表团到访美国所，就美国大选、钓鱼岛问题、中美关系等议题与科研人员座谈。黄平所长主持座谈会。
- 10月30日 美国前四星上将博伊德访问美国所，就中美互信等议题与科研人员进行座谈。黄平所长主持座谈会。
- 11月1-11日 刘卫东副研究员应美国坦普大学日本校区东亚研究所的邀请，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
- 11月2日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到访美国所，以“中美关系——近期和长期的走向”为题发表演讲，并与科研人员座谈。黄平所长主持会议。
黄平所长、王荣军研究员、姬虹研究员会见美国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叶文(WEN-HSIN YE H)，商谈合作事宜。

- 何兴强副研究员会晤美国大使馆政务处官员约翰·科盟 (John Kemmer) , 双方就钓鱼岛问题进行交流。
- 11月3日 黄平所长和倪峰副所长出席中美人文交流基地揭牌仪式暨学术委员会会议。
- 11月5日 倪峰副所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题为“对中美关系的一些认识”的专场报告。
- 11月6日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应邀来到美国所, 作题为“近代中国西藏地区演变历史与民族关系”的学术报告。
- 11月9日 黄平所长出席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
- 倪峰副所长参加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与《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举办的中美关系研讨会, 并作题为“新一届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走向”的发言。
- 11月11-17日 周琪研究员访问美国佐治亚大学国际贸易与安全中心, 参加“中美战略贸易与安全双轨对话”。
- 11月12日 倪峰副所长参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举办的“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研讨会, 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题发言。
- 11月13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副教授傅泰林 (Taylor Fravel) 到访美国所, 以“中国与东亚海洋争端: 美国的视角”为题发表演讲。
- 11月14日 倪峰副所长参加由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举办的“大选后中美关系走向”研讨会, 作题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的发言。
- 仇朝兵副研究员会晤新加坡使馆一秘云大厚, 双方就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等议题进行交流。
- 11月15-19日 魏红霞副研究员赴台湾参加第十届“全球战略与台海安全”研讨会。
- 11月16日 美国研究所与信息情报研究院共同举办“大选后的美国亚太战略走势及中美安全关系”研讨会。黄平所长、倪峰副所长主持会议。
- 11月21-22日 倪峰副所长参加由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与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2012年国际形势回顾与2013年国际形势展望”研讨会, 并作题为“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发言。

- 11月22日 “中美公共外交：实践与经验”学术研讨会在美国所举行，黄平所长主持会议。
倪峰副所长参加由太平洋地区合作委员会举办的“首届东亚地区安全合作论坛”，作题为“当前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特点”的发言。
- 11月23日 黄平所长参加由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研讨会并发言。
倪峰副所长参加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的“传媒与国际关系”研讨会，就“中美关系与全球秩序”作专题发言。
- 11月24-25日 黄平所长参加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年度会议并发言。
- 11月26日 美国所主办“2012年美国大选后的中美战略关系走向”学术研讨会，黄平所长、倪峰副所长等主持会议。
- 11月27日至
12月11日 黄平所长随同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访问古巴、西班牙和希腊。
- 11月29日 倪峰副所长参加总参二部举办的“2012年国际战略安全形势及我国国家安全新变化”研讨会并发言。
- 12月6日 倪峰副所长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与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举办的“第三届亚洲论坛”，就“美国亚太政策的走向”作主旨发言。
- 12月7日 美国公共研究与规范组织创始人兼总裁罗伯特·琼斯 (Robert P. Jones) 到访美国所，就美国大选、美国宗教等议题与科研人员进行交流。
吕祥副研究员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项目资助，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进行为期6个月的学术访问。
- 12月10 - 13日 沈鹏助理研究员赴韩国首尔出席“峨山中国论坛”。
- 12月12日 黄平所长出席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召开的“构建新型中美关系”研讨会并发言。
- 12月12 - 16日 王荣军研究员参加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团组赴美，执行第四轮中美青年对话会任务。
- 12月13日 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访问美国所，作题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爆”的学术报告。黄平所长主持会议。
黄平所长、倪峰副所长和部分美国所科研人员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举办的“2012年国际热点、焦点问题研讨会”。

- 12月16日 倪峰副所长参加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举办的“2012年公共外交论坛暨第五届外交官论坛”。
- 12月17日 美国戈登学院院长米歇尔·林德萨 (Michael Lindsay) 到访美国所，作题为“美国领袖如何影响其周遭世界”的演讲。黄平所长主持演讲会。
- 12月20日 黄平所长会见美国基辛格事务公司执行主任、《北京共识》一书的作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先生。
- 12月21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中国企业海外风险管理论坛”在京召开，会议主题为“应对新形势下的海外政治风险”。美国所所长、院世界政治中心主任黄平主持论坛。
- 12月22日 黄平所长出席“2012年环球年会：未来10年的中国与世界”并发言。
- 12月25日 黄平副会长出席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2年年会，并就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发言。
- 12月27日 黄平所长给中国银行联谊会作专题讲座，主题为“中国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与战略选择”。

(方锐华 周婧 整理)